

目录

一、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建立.....	1
二、1953-1956 年农村的合作化高潮.....	3
1、粮食“统购统销”的出台.....	3
2、农村社会主义高潮.....	4
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8
1、大跃进的思想的起源和发动.....	8
2、农村的粮食高产卫星和深耕密植.....	19
3、人民公社诞生.....	25
四、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成绩与缺点.....	33
五、反思与其他.....	42
1、领导人的态度.....	42
2、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出口.....	43
3、苏联逼债的真相.....	44
4、为了面子不惜蒙骗自己和世界人民.....	46
六、尾声.....	50
参考.....	57

一、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明确的，就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是这个“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如何过渡？要花多少时间来过渡？

1952年10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斯大林提交了一封信，目的是阐述中央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政策，向斯大林“请教”经验：

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1\]](#)

斯大林看了信表示：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2\]](#)

十年到十五年实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52年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毛主席改变了看法。

1952年2月下乡调查发现，农民整体拥护农民合作社制度，当地领导汇报说：

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某社实行合作社，粮食当年增产20%。

毛主席调查完毕后对随行人员说：

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3\]](#)

1952年12月，政府开始进行税制改革。《人民日报》宣传新税制度时，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随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

“热烈地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新税制改革引起了一些波动，比如私商观望、抢购物资、思想波动等。毛主席批评制定新税务制度的人说：

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

当然如果要细说关于过渡时期的方针和政策的认识 and 分歧，没有几万字是写不完的，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在1953年下半年对于路线基本达成了一致。1953年9月最终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这样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5]

这里有两条资料可以说明，此时毛主席的想法。

1953 年 10 月份，毛主席针对城乡之间物资供应的矛盾说：

总路线也可以说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6]

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主席表示：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7]

综上所述，1953 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这样的：

在先改变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普遍规律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基础的唯一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之所以要先说清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因为人民公社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形式，与“总路线”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它又受到了领导人主观认识的影响。

二、1953-1956 年农村的合作化高潮

1953 年新中国开始进行“一五计划”并确立“总路线”，此时农村还没有出现人民公社这一产物，主要以农业互助组的形式存在，而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比很小。

1953 年 11 月的统计显示，全国有农业互助组 745 万个，参加的农户为 4564 万户；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1.5 万个，参加的农户 27.5 万户。

1、粮食“统购统销”的出台

但是 1953 年马上出现了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53 年基本建设投资比 1952 年增加 75%，工业产值增加 30%。

1953 年城市人口比 1952 增加 663 万，达到了 7826 万。

同时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要求经济作物面积也不断扩大，导致有几千万缺粮农民需要国家提供粮食。

当年粮食产量 3390 亿斤，按照历年 25%左右的商品粮比例，1953 年需要的商品粮保底为 700 亿斤。

1953 年春天，土地改革已经全部完成，改革完成后，农民缴纳的天赋粮食

为 275 亿斤，商品粮缺口为 431 亿斤。

农民余粮也并不是太多，虽然粮食产量增长较快——1953 年粮食产量 3300 多亿斤，比 1949 年增加 49%。但增长的粮食，一方面被农村增加的人口消耗——1952 年农民消费粮食比 1949 年多 370 亿斤；一方面被农民多吃了——1952 年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 1949 年增加 74 斤。

这里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农民的存粮也不是太多：

1953 年河北省某县，农民平均每人积存余粮仅为 30 斤左右。

所以，1953 年的粮食市场就表现为供小于求。

本来，国营粮食公司对于平衡市场波动有很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个粮食市场牌价，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时，国营公司就向市场抛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牌价时，国营公司就大量收购。

此种策略可以在粮食市场小幅度波动时，稳定粮食市场，打击粮食投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是当粮食供给严重小于市场需求时，这种策略就失效了。

农民眼见市场价格高于牌价，将余粮待价而沽，国家就不能收到多少粮食。

由于市场价格高于牌价（在主要产粮区高出牌价 30%—50%），不少粮食私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

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牌价存在差异，出现了跨地区收购、贩卖粮食进行获利的现象。

为了解决粮食缺口、稳定粮食市场。1953 年 10 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在农村对粮食进行统一征购，在城市对粮食进行统一配售。

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农民的粮食负担分为两部分：交农业税的粮食（无偿上交）、国家偿征收的部分（按一定价格购买）。

关于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文件这么写道：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8]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是 1953 年粮食市场不稳定直接催生的，但它依然受到了“总路线”的影响。

在领导人看来，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不光是稳定国家粮食市场的措施，也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其实质就是：

在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国家掌握粮食、平稳粮食市场。农民并不愿意在刚刚吃饱饭的情况下，将所有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和市场。所以必须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对粮食进行统一征购和配售。以解决高速工业化、城市人口增加，与小农经济缓慢增长之间的巨大矛盾。

2、农村社会主义高潮

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掀起了高潮。

农业合作社的指标一再加码：

1953 年 12 月计划到 1957 年发展 80 万个；

1954 年 4 月计划 1955 年发展 30-35 万个、1957 年发展 130-150 万个；

1954 年 10 月又提出，到 1955 年春耕前发展 60 万个，组织 50% 的农户入社。

1954 年 11 月又将 60 万个的指标提高到 70 万个。

1954 年 4 月，农业合作社由 1953 年 11 月的 1.5 万个，上升到 9 万多个，参加的农户由 27 万增加到 170 万。

1954 年年中，合作社发展到 11.4 万个，参加农户 29.7 万户。

到 1954 年年底，合作社发展到 48 万个。

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人民群众的热情越来越高。

在追求数量的同时，还出现了追求大社的倾向。

这个合作社的高潮和入社的狂风暴雨，当然也会有人抵触，比如屠宰牲畜和毁坏农具。

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反应抵触和粮食紧张情况的报告变多。

这些报告送到中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55 年 3 月，毛主席找到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及其他人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 年以前 1/3 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 50%。[\[9\]](#)

3 月 3 日，下达针对农村合作社运动和统购统销工作的指示，要合作社运动缓一缓，增加对农村的粮食供应（返销粮）。

4 月初，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了解到地方反应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想搞“社会主义”。

毛主席联想到 1953 年某些人的’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感到“这种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构干部中也有。”[\[10\]](#)

经过 3 月份的整顿，各地粮食紧张情况缓解。

这些整顿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又感觉，所谓的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

有时候，上级要求搞什么，下级就报什么。

你要加快合作社的发展进度，我就超标完成。

这样地方的报告送上来，领导又认为人民群众热情大，可以再加码。

你要整顿农村工作，合作社要缓一缓、统购统销要照顾农民，我也超标完

成。

薄一波曾经这样总结党内生活中这种反应问题的心态：

在我们党内生活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11\]](#)

毛主席由此判断，地方不是真的缺粮，大部分都是假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问题向我们进攻。

同时“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低：1953 年增长 30%，1954 年 16%，1955 年只有 6%。

增长下滑的原因主要有，国家积累资金的速度不快，外汇勉强维持平衡，不能搞大规模的建设；来自农产品的原料不足。

毛主席此时基本的判断是：农村形势紧张和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农民加入合作社生产不积极，也不是农民真的缺粮，而是领导农村工作的人，判断和政策有误。

在批评了邓子恢的错后，1955 年 6 月，中央通过的农村文件宣布：今后一年合作社由现有的 65 万个发展到秋收前的 100 万。

刘少奇觉得速度还是太快，指示日期由 1955 年秋收前推迟到 1956 年春天。[\[12\]](#)

但是毛主席表示，指标太保守，建议翻一番，增加到 130 万。但邓子恢表示不同意这个指标。

7 月底，在中央召集的省市区书记会议上，毛主席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批评邓子恢等人收缩合作社的政策，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只配下做出来的”，“犯了右倾错误”。

毛主席作的这个报告，强调“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13\]](#)

不出意料，邓子恢作出检讨，会议一致通过加快农村合作社发展的进度的决议。

上面批判邓子恢的右倾错误，下面也要找出来地方的“邓子恢”，批判右倾错误。一时间地方各种检讨工作，批判右倾分子的材料递交上来。

在这种形式下，10 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的错误又被升级为“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只反应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14\]](#)

大会上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发言，批判邓子恢的错误，认为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路线正确。

在这种形式下，农村合作化进入大风暴式疾风骤雨的发展。

8 月开始的各地区检讨右倾错误的报告中，一致认为，要坚决争取超额完成中央要求翻一番的任务。

于是层层加码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7 月底毛主席的报告提出的规划是，到 1960 年全国农村的农户基本上都参

与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但是各地区的报告，将这个时间表提前，纷纷表态超额完成、超前完成。大部分地区提出可以在 1957 年实现初级化。

上面批判右倾错误，下面表示指标和时间可以加大和提前。

于是形成了一种相互证明和互动的关系：下面的报告表明毛主席判断正确、邓子恢的确错误；下面的报告表明，人民群众的热情很高，中央的时间表比较保守。

于是，时间表被再次修改。10 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加码的时间表：

合作化程度在 1955 年夏达到 30-40% 的地区，可以在 1957 年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合作化程度在 1955 年夏达到 10%-20% 的地区，1958 年春季左右实现初级合作化。

中央提前时间表，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回去后，又将时间表提前：紧跟总路线，提前完成任务。

在收到地区表示还能提前的报告后，毛主席预计：

看来群众的热情很高，可以肯定 1956 年下半年除新疆外，基本上可以完成初级合作化。

不过人民群众的“热情”再次突破了领导人的预计。

1955 年年底，全国合作社由年中的 60 多万增加到 190 万，入社农户由 1692 万增加到 7545 万。

入社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重，从年中的 14.2% 增加到 63.3%。

这种狂风暴雨般的入社狂潮是怎么实现的呢？举几个当时的宣传和新闻报道，大家就能理解了。

高级社是天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喝牛奶、吃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走合作化这条道。迟不如早，早不如快，早入早主动。

热情太大，毛主席觉得还可以提前。1955 年 12 月份，毛主席提出：

合作化的进度，1956 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社的工作，入社农户达到 80-85%；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在 1960 年基本完成，或在 1959 年基本完成。

形势还是超出了领导人的判断，农民的“热情”还是赶在了领导人的判断之前，几乎是日日喜报传来。

到了 1956 年 1 月，中央通过的文件又加码要求：

合作化基础较好的地区，在 1957 年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其余地区在 1958 年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

于是，地方又刮起了高级化的热潮。

到 1956 年 5 月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了 1.1 亿户，占总农户的 91.2%；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了 7472 万户，占总农户的 62%。

1956 年年底，入社农户达 1.18 亿户，高级社农户达到了 1.07 亿户。

至此，农村已经基本完成“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农村合作化的狂潮，证明了领导人判断的正确：先改变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力；农民是积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1、大跃进的思想的起源和发动

关于“大跃进”思想产生的来源，很多人以为是领导人一拍脑袋决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大跃进”的提出，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毛主席提出赶超型发展战略，总的来说，是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化的一种选择——时间不等人。

1955 年 3 月份，毛主席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

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5\]](#)

注意这里的提法是：“三个五年计划（15 年）基本工业化”、“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955 年 10 月份，毛主席对这一讲话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大约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16\]](#)

农村合作化在短短三年就完成了，使得毛主席的信心大增。

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指农村合作化运动），经过二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末，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17\]](#)

1956 年，中国在帮助赫鲁晓夫解决波匈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威望大增。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大会上，中国的政治地位很高，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依靠与众不同的演讲风格，以及处理波匈事件的威望，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角。[\[18\]](#)

但当时的中国，经济依然比较落后。这种情况显示出中国政治上的大国、经济上的小国的局面。

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将在 15 年后赶上和超过美国之后，毛主席不甘落后，提出中国要在 15 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

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

从这个方面来说，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响应了赫鲁晓夫的号召（或者说与赫鲁晓夫争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将毛主席的口号公开：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20]

但是，此时开展大跃进，还有阻力。

由于1955年9月份，已经预感到当年计划指标不能预期完成，全国开展了一场批判经济建设的“反右倾”运动，勉强完成了目标。

在“多快好省”和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空气下，1956年2月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标准是这样的：

工业产值536亿元，比1955年增长19.7%；（这个数字为原定计划1957年的水平）农业总产值609亿元，比1955年增长9.3%；粮食产量3990亿斤，增长8.4%；棉花3556万担，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147亿元，比1955年增长71%；

这个草案报告也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

进度的定的太快，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觉得应该压缩一下指标。（实际上，基本建设投资最初的指标是170多亿元，在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下，削减到147亿元。）

当时的毛主席并不同意这个指标，认为右倾保守主义还在作怪。

1955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提出追加基本建设投资20个亿，与会者大多数都不同意这一建议。

事实上，由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导致财政赤字较大，作为主管政府工作、了解财政情况的周恩来，是比较熟悉这一情况的。所以他是反对盲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

1955年5月份，周恩来提出：反右倾保守主义，从去年8月份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随后，计划的各项指标进行了小幅度的压缩。

6月份，《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21]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社论是在搞平衡，后来这个社论遭到毛主席的批判。[22]

随后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

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23]

随着“反冒进”的开展，1957年的计划指标被压缩到如下：

工业产值 603 亿元，增长 4.5%；农业总产值 612 亿元，增长 4.9%；基本建设投资为 111 亿元，为 1956 年的 80%。

这就是 1956 年的“反冒进”，也就是发动“大跃进”的阻力。[\[24\]](#)

必须发动反“反冒进”政治攻势，否则“大跃进”也无法顺利推行。

毛主席想到了华东地区，这里的地区领导一向紧跟毛主席的指示。

1957 年 12 月份，毛主席南下来到杭州，召集华东地区领导人，召开吹风会。

其中浙江省领导人和上海市领导人的报告深得毛主席的赞赏，亲自批阅修改，加上编者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要求全党学习。[\[25\]](#)

事实上，当时的《人民日报》，已经开始形成反“反冒进”和“跃进”的气氛了，举几个当时的新闻标题：

1956 年 12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有 4 篇是“跃进”和“创记录”的报道。

农业生产一定能够大跃进——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旁听记（1957-12-27、第二版）

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1957-12-28、第一版）

完全可以跃进！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旁听记（1957-12-28、第二版）

广东十年后将成为“糖蔗万斤省”（1957-12-31，第二版）[\[26\]](#)

1957 年 12 月 25 日，柯庆施在中上海市一届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发布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为题的报告[\[27\]](#)，谈了上海完成一五计划的情况，工业产值超过计划 163%，整个形势一片大好。批评“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说法。认为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这一点上。

柯庆施的报告，是第一个响应毛主席“15 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柯庆施在报告中这样打气：

有利于我们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连英国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到十五年工夫英国就要落在我们后面。

1958 年 1 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以及华东地区领导人。

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讲，这次会议“是放火”：

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用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28\]](#)

随后，反“反冒进”从经济建设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1 月 11 日，南宁会议召开，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定了调子：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

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29]

第二天，毛主席将批判的调子继续升高，著名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出自这次会议发言：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30]

1月16日的会上，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的报告问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31]

根据会议参与人的谈话记录和事后的回忆录，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被集中批判，会议气氛很紧张。周恩来不得不做非常严厉的检讨，以求过关。

1月19日，周恩来发言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承认：“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32]

南宁会议决议正式确立“大跃进”的思想与理论指导，明确工作“要以一个人为核心”，最后形成决议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

这份“六十条”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

各地方的工业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33]

其中明确规定需要建设“浮夸风”期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试验田制度：“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

柯庆施再次在南宁会议上大出风头，被点名表扬，当作“头号标兵”被大家学习，参加会议的人纷纷表示，要头脑大大清醒起来，我们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

没有参加南宁会议的陈云，当时主管财贸工作，在2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错误。

毛主席批评陈云：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34]

陈云检讨说：

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经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35]

确立“以一个人为核心”、反“反冒进”对“大跃进”的推行依然还不够，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影响了八大的决议：没有提毛泽东思想。[36]

现在推行“大跃进”，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

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37]

薄一波后来总结说：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38]

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继续鼓劲，宣传“破除迷信”：

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尊重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当作神明，不敢触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要用点思想，不能抄书照搬。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39]

柯庆施作为相应毛主席“大跃进”号召的“头号标兵”，在成都会议上大出风头，他说：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0]

当然，毛主席根据历史经验和自己的观察，明白党内外对这种“大跃进”的思想理论，存在不同意见。在1958年4月份的武汉会议上，他这么说：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

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41]

在武汉会议上，他还反复强调阶级斗争：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42]

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了“观潮派”、“算账派”的帽子，并且将不同意见的分歧，上升为党内外的阶级斗争。这样更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了。

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都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始“大跃进”的社论和新闻：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新跃进，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订得是比较积极的。工业生产总产值计划比1957年增长14.6%，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8.8%，消费资料生产增长9.7%.....

我们有没有条件争取我国国民经济来一个新的跃进，完成并且超额完成1958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呢？完全有这种条件。[43]

1958年5月5日开幕的八大二次会议，成为了全面发动“大跃进”的标志。

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并作出正式结论，报告及决议认为：

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使生产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即“两头高，中间低.....对“大跃进”、高指标持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会后，各地普遍开展“拔白旗”和批判“观潮派”、“算账派”的斗争。[44]

会议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各地区、各部门也纷纷提出各自的跃进计划和生产高指标。

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与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相比，工业方面普遍提高1倍左右，农业方面则提高了20%—50%。其中，计划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钢的年产量指标由八大确定的1050—1200万吨提高到2500—3000万吨；粮食由5000亿斤左右提高到6000—7000亿斤；基本建设五年投资总额由900亿元提高到1500—1600亿元。按照这样的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6%—32%和12%—16%。[45]

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

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到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这里毛主席列举了二十多个中外名人的例子）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

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46]

5月18日，毛主席将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并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47]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来源。

当然，毛主席并非没有考虑到“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他在5月17日的讲话，谈到了失败灾难和党内分裂的问题：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假如有人不愿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愿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但又会走向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党大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摔跟头。凡是不愿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48]

当然了解毛主席性格的人都很清楚，所谓的“火灾大难、赤地千里、党内大乱”是毛主席讲话，经常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原因。从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已经认识到，发动“大跃进”可能遭遇失败，会被“算账”、党会分裂，还是信心十足，要求不同意见的人顾大局。

会议最后在各大代表用户毛主席，高唱赞歌的氛围下达到顶峰。各省地区的领导人纷纷发表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其中“头号标兵”柯庆施的报告，最具有代表性，他率先向大家抛出了十五年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达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人们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那时，城市变成了大花园，农村变成了工厂林立、街道整洁、卫生体育设备齐全的小城市，“村村流水，户户垂杨”。那时人们的疾病将大大减少，健康水准将大大提高，而逐渐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类。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综合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49]

会议还对周恩来、陈云进行了批判。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周恩来的错误为：“反冒进”是犯了方针性的错误：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

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 20 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50]

会议对人士任命进行了变动，紧跟毛主席的柯庆施、李井泉等成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

会议继续加强了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和指挥作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毛主席在通知中写道：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51]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提出不再担任总理一职[52]，稍后彭德怀也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一职，不过他们的辞职要求并未获得通过。

八大二次会议后，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不能再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突然袭击、强迫签字、事实封锁”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和执行权都归于中共中央。

大跃进发动，首先第一条就是打击右派、统一思想。周恩来虽然被定性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作了多次检讨过关，但是地方上的右派分子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 3 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就详细说明了地方上的右派是什么标准：

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53]

毛主席还直接给右派定性：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54]

于是，地方开始掀起打击清算右派的运动：

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自治区党组成员伊敏诺夫、艾斯海提；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衡，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云南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等等，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55]

从 1958 年 3 月开始，各地方就开始发展县、社工业。用当时中央的话说，叫做“地方干劲比我们中央足”。

当然这种现象和当时中央财政吃紧有关系，很多高指标的任务，中央的确难以拿出来财力物力来支援，只能发动地方想办法“大跃进”。
[56]

这里引用几篇地方的报告，来说明地方“大跃进”开始的劲头：

甘肃省，1958 年 1 月到 3 月，全省办厂一千多个，3 月到 5 月，建厂三千五百个，5 月到 6 月，全省厂矿数目激增到二十二万个。其中省办的二千五百多个，县办的一万五千多个，乡办的一万六千多个，社办的十八万五千多个。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个“千厂乡”，五十多个百厂社。全省每个乡平均有一百一十个厂矿，每个农业社平均有十二个厂矿。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建起 1530 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有三十五个工厂投入生产。人口仅有十三万多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 5 月底就建厂矿 307 座。

安徽省安庆地区十三个县统计，到 1958 年 5 月底止，仅社办工厂就达到 19418 个。新乡市的储蓄款项除上缴九十万元之外，都归市里适当调度使用。1957 年全市实际完成储蓄额是五十万元，1958 年要保证达到三百万元，争取六百万元以上。

河北省邢台县决定：1958 年创建八个小型炼铁高炉（争取完成十二个），7 至 8 月分别投入生产，产铁达到 1200 吨。1959 年小高炉累计发展到十五个，年产量达到 2.2 万吨，除满足本县自用外，还可以交给国家一万吨；1958 年创建四个小型土法炼钢厂，8 月投入生产，至年底产钢 2.5 万斤。1959 年累建为五个，全年产量达到七万斤；1958 年创建小型水泥厂九十九个，产水泥 2700 吨。1959 年在改进生产方式前提下年产达到一万吨，基本上达到自给；1958 年创建土法炼铅矿一个，9 月投入生产，至年底产铅 1.5 万斤，1959 年加以扩建，全年总产量达到五万斤。

海伦县福海乡新建农业社，本着白手起家，勤俭办厂的方针，仅花 180 元，就办起了颗粒肥料厂、小烘炉、木工组、被服加工厂、钾盐制造厂，皮革厂，联合加工厂（包括碾米、铡草、饲料粉碎、发电）、酒厂等八个社办厂，并很快投入生产。

河南省登封县在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的基础上，最近又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的新的要求。全县要在今年基本实现水利化和绿化，每亩产量达到六百斤，每亩施肥料三万斤。地方工业也将在三年内赶上或超过全县农业生产

总产值。

1958年3月3日，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57]。指出：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我们必须对于群众的创造。虚心地进行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战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改。[58]

指示下达后，各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运动，形势一天比一天“好”：

铁道部提出了今年再为国家增产节约四亿五千万的计划。除了力争加快新建铁路建设速度外，计划把新建铁路平均每公里的造价，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十六万六千元，降低到四十万元。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就可节约二十五亿元。还计划把1958年的货运量由三亿一千万吨增加到三亿三千万吨。

化工部抓住氮肥和硫酸等厂的定型设计展开了深入的辩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预计可以为国家节约大约七亿元的资金。

粮食部在1958年大约可以为国家节约三亿多元。

轻工业部预计今后五年国家对盐的投资不变或增加少量投资，建设规模可以由原定八百万吨提高到一千六百万吨；糖的产量可以由原定二百一十万吨提高到四、五百万吨。

冶金工业部受到十六万张大字报的冲击。到5日上午，这个部的领导上已认为全国冶金工业可以增产七十六万吨钢，达到今年生产七百万吨钢的任务；同时认为今年可以再增加二亿三千万的上缴利润。[59]

化工部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重新审查和修改了厂房设计，一个年产八万吨接触法硫酸厂，根据原来设计，需要投资八百二十万元，现在只需500万元就够了。这一设计修改，原来准备兴建30个厂的投资，现在可以兴建五十个厂，硫酸产量由原来的240万吨增加到400万吨，这是工厂设计大跃进的事例之一。

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从反对设计浪费和保守以来，检查了130项设计工项，修改了550张图纸，为国家节约资金九百多万元，这是民用建筑设计大跃进的事例之一。

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生产的锅驼机，每马力九十公斤，跟最先进的煤气机比起来重量要大七十公斤，经设计人员研究，准备降到二十三公斤，这是机械产品设计中大跃进的事例之一。[60]

如同2年多前的合作化高潮运动一样，各种赶超时间表被一再提前：

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学肥料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四

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 1962 年氮肥产量可达到 1800-2000 万吨，再加上 500-700 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十年内赶上英国，也就有希望了。[61]

水力电力部在 4 月份也表态：加快发展：十年赶上英国；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全国电气化；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

毛主席 4 月 2 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

4 月 27 日，毛主席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十五年能否超过美国？”

各路捷报频频传来，5 月 18 日，毛主席就安东机器厂这个小厂，工人们经多次失败，克服技术、工具、材料设备和财务上的困难，终于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写下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断言，这种“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62]

领导人发布了新的时间表，各部门和各地区纷纷表态加码。

6 月 6 日，冶金工业部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1962 年，可产六千万吨钢。”

这个数字，比王鹤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 1962 年达到三千万吨翻了一番，几乎相当于 1967 年的产量。仅仅过了一个月，钢的产量就开始“大跃进”了。[63]

6 月 16 日，李富春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要点》估计，1958 年钢产量可能达到八百五十万吨到九百万吨。。

6 月 18 日，经过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开会商议，最终 1958 年钢产量定位一千万吨，1959 年定位二千五百万吨。

由薄一波修改送审的《关于 1958 年形势和 1959 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这样描述：“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各部门送来的报告不断加大指标、提前时间表，使得毛主席作出了 1958 年钢铁翻番的决策：

6 月 19 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所以，是 6 月 19 号才决定搞一千一。[64]

6 月 22 日，冶金部送来报告，继续加大指标、提前时间表：

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

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 1962 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工作。[65]

同日毛主席将薄一波的报告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并批示：

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66]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钢产量“跃进”的过程：

2 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定为 624.8 万吨；3 月成都会议钢产量提高到 700 万吨；5 月八大二次会议钢产量又提高到 711 万吨；6 月份指标节节攀高，最后定为 1100 万吨。

1957 年 11 月提出“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1958 年 5 月在内部提出“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6 月，先是“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最后认定“两年超过英国”。

回顾钢产量的“跃进”过程，不难看出，由毛主席发动反“冒进”为先，其他领导人批评检讨、拥护毛主席路线、各地区领导人层层反保守紧随其后，放手发动群众，上层下达大于快干多快好省的竞赛精神，下层又层层加码，导致上下互动，指标时间被一再加大和提前。就如 2 年多前的合作化运动一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如果这时候有一些人，头脑不那么发热，冷静下来思考，提出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意见，是不是可以阻止这场不切实际的运动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就是真理、不服不行，提意见的、强调要稳步建设的人，都被批判为右派、保守主义分子、反动分子等后，试问：又有多少人敢冒险发表这类意见呢？

事实上，在 1958 年下半年，毛主席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些指标的不切实际。

1958 年 11 月毛主席对柯庆施说：

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说华东搞六百万吨到八百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

1959 年 7 月 23 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1070”这个祸时说：

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这个发明权怎么办？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这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八百万吨，我全国只搞 1070 万吨。” [67]

2、农村的粮食高产卫星和深耕密植

在前面我们讲过，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狂潮（又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本身就是一种上下互动、层层加码的政治动员游戏。人民公社运动，也不例外。

1958年初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三年看头年等口号以后，各地纷纷改订计划，提高粮、棉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争取提前、提前、再提前实现农业指标。

首先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提出了一年翻一番，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

曾在南宁会议上受到表扬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则表示：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4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68]

农村的“大跃进”从深耕密植开始。深耕密植的浮夸还要从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说起来。

农业八字宪法是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保”指植物保护，“工”指改良工具，“管”指田间管理。

薄一波对农村“深耕密植”有过一段让人深思的回忆文字，这里摘录如下：

毛主席听说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同志搞深翻。他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省长葛县县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1958年4月底，33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寸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据他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几倍。

毛主席5月2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的经验向所有各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长葛县今年一年就把全县的耕地112万亩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

后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

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番薯、谷子也可以算。[69]

与“深耕密植”对应的是农具改革的风气，毛主席在3月份的成都会议就指出了改革农具的重要性：

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70]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领导人提倡什么，下面就搞什么，而且加倍的搞。仅仅举几个当时的报告和新闻说明：

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车子化运动”、“碌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五花八门。只要一处出现“发明”，立即就会报道宣传，很快被普遍推广。

湖北当阳县通过工具改革，全县兴修水利工程节省了人工五十七万二千个，在整个冬季生产中，估计节省出一百多万人工，投入农业的全面生产。[71]

在过去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湖南省即创造和改良生产工具、排灌工具、运输工具和农副产品加工工具等达七千多种，推广了四百多万件。全省已有二十多个县基本上实现了运输“车子化”和“船运化”。由于改良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提高了劳动效率，全省约节省六亿八千多万个劳动日，保证了各项增产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72]

全国农具展览会占地六万平方公尺左右，共分十个馆，即综合馆、耕作机具馆、农田灌溉排水机具馆、农村运输工具馆、农产品副业加工机具馆、经济作物机具馆、农用固定动力机械馆、植物保护机具馆、畜牧机械馆、林业机械馆。展出了从耕作、排灌、运输、加工到水利施工、动力、防治病虫害、林业、畜牧等方面的三千多件农具。包括从春耕到秋收，从平原到山区，从旱作到水作的多种多样的农具。其中主要的是当前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中，广大农民、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在生产实践中间、在劳动中间改造、创造和改装的农具。三千多件农具中，属于广大工农群众自己制造的占80%以上，创造发明、改造改装的占40%以上。此外还包括我国各地原有的旧式农具，解放以来推广的各种新式农具，和一部分动力农业机械。[73]

如果说，改良农具能否见效，还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就得经过一茬农作物的收获才见分晓，因此，并不易被农民接受。

基层干部为贯彻上级推广的“先进经验”，就采用大辩论开路，按领导布置做就插红旗，不听则插白旗。结果，深翻变成翻得愈深愈好，有的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也变得愈密愈好，有一些地方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给插白旗。

对当年这种领导方法，有人这样评价：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74]

“放卫星”演变成“浮夸风”，如果说当时放高产卫星还算政治和社会气氛的话，那么演变成浮夸风则是现在的人哭笑不得。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因此，在1958年比喻“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氛下，人们把“高”上了天的产量，称之为“放卫星”。从夏收开始，各地纷纷报道小麦、早稻丰收放“卫星”的记录。

这里引用一段网上总结的关于《人民日报》“放卫星”的记录：

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中间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

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11亩小麦单产3215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进行报道。

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在头条位置刊登消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

6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3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一版，《人民日报》又刊登消息称：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在1亩7分地上）。

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刊登新华社消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是截至目前，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十三万多斤。

截至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为强化高产卫星的舆论效果，报纸都配发有现场照片。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8月13日刊登的一幅照片是：四个小孩（两男两女）站在丰收的早稻田里——“看稻子长得如此‘稠密’，孩子们就像站在沙发上”。实际上，那些离奇的粮食高额丰产典型，基本上都是采用“并田”方法（把许多块茁壮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到一块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如山东寿张县推算，一亩谷子密植四五十万株，一棵谷穗

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

面对粮食高产“卫星”，一开始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都深信不疑。

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廉，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作了鼓励。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猪肉一百斤，油二十斤，棉花二十斤，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有粮食一千五百斤”。[75]

6月25日，谭震林将自己在会上的总结报给毛泽东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1957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76]

“放卫星”时还不忘记对“观潮派”、“算账派”的敲打和挖苦：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在飞跃的速度面前，“观潮派”“算账派”应该及时猛省了》：“在去年，不少的“悲观论”者，曾引用“河南地瘠民贫，耕作粗放”、“小麦是低产作物”等“论据”，断言今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几，绝对不能增产百分之几十，但今年全省不分山区、沙区，平原和灾区到处丰收，小麦亩产千斤，已成为普遍现象，最高的遂平县术星农业社创造的亩产记录每亩达3530斤。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小麦不仅不是什么低产作物，它已经迈进高产作物的行列了，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总路线，不论在什么地方，生产都能大跃进。所有的“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他们在河南永远也看不到他们的“潮”、算不出他们的“账”了。”[77]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78]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了工业的基数大了，发展的速度可以更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连曾经出现过跃进高潮的1956年上半年也不可比拟。谁说基数大了速度就必然慢下来呢？不久以前，农业上的“秋后算账派”和工业上的“年底算账派”，还自以为握有一张最后的王牌。现在，却不需要待秋后，不需要等年底，单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这笔账，就可以证明他们的所谓“王牌”，不过是一张废纸，他们的输局早已是确定无疑的了。[79]

不仅各地干部和中央领导人一开始深信不疑，连不少科学家也从科学角度论证“高产卫星”的合理性：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署名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二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倍！只要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

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80]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7月1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于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为它的奴隶呢？在“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看来，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则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如果需要的话，到1962年广东就可以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或者更多一点。一向被认为是低产作物的小麦，今年尚且出现亩产7000多斤的记录，那么，高产作物的小麦，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81]

这些文章的观点，在现在看来，都陷入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中，难以想象竟然出现在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基本哲学理论的新中国。

1958年7月28日，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说“今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413亿斤，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上年增长70%。在夏收粮食作物中，冬小麦总产量达到689亿斤，比上年增长279亿斤，增长68%。平均亩产193斤，比上年增长71%。[82]

为消除“观潮派”、“算账派”的怀疑，各地方领导人还“拍胸脯”、“人格担保”粮食高产数据。《人民日报》等报纸在当年发表了不少“实地调查报告”，既然是“实地报告”，必然记者现场验证过——调查才有发言权。不管是记者被蒙蔽，不少中央高级领导人都信服了。举几个例子：

到了安徽省枞阳县高丰社以后，一股办喜事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不论主人和客人，个个都怀着喜悦期待而又激动的心情。要看这颗早稻高产“卫星”究竟有多大。

当我们走到这块“卫星”田的时候，都禁不住惊叫起来：“好家伙，长得这么好的一块稻！”这块田呈长方形，共一亩零四厘二毫，田里长的稻子就像堆的稻场似的，足足有二尺多厚，最厚的地方有三尺以上，一眼望去，田面上铺着一片金黄色的稻穗，挤得满满的，很少看见叶子，因为叶子都压到稻穗底下去了。我们用手拨开表面的一层稻穗，看到下面还有一层一层像平铺的稻穗。有个同志用手插进去，惊喜地说：“啊呀，好像插在稻箩里了。”我们又随手摘下几个稻穗数了一下，最多一穗是三百四十粒，一穗是二百九十七粒，最少的一穗是二百零六粒。这块田是采用2×3寸密植的，每亩约有十一万蔸，二百四十万穗。用力拔起一株稻来看，叶子有四五分宽，稻杆非常坚硬，有筷子那样粗。稻杆几乎一根挨着一根，密密的挤在一起了，约成四十多度的角度一边倾斜着。一个社员告诉我说：“在抽穗成熟以前，每株稻都笔直的立着，约有中等身材的人一般高。抽穗灌浆以后，稻穗沉沉下垂，压弯了腰，就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这位社员又说：“稻株没有倒伏，栽得密是原因之一，一根紧靠一根，要倒伏也倒不下来。”这时很多参观的人在田边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农业科学工作者正在采集标本，摄影记者和摄影师正在寻找异

乎寻常的稻穗。上海、四川、贵州等地参观团的同志，想从田中间挖出一平方尺全蔸水稻，进行科学研究。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走进田去，只好在田两角挖了两块。我们详细地观察这块早稻，想起前几天在一个农业社里，有个社员曾经形容他们的早稻说：“我们的早稻长得连一个鸡蛋放在稻面上也碾不下去。”现在看了这块早稻田以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这块田平铺着的两三尺厚的稻面上，就是放上个西瓜也不会掉下地去。[\[83\]](#)

今年4月间，我到四川省内江县顺江农业社去了一趟。那里田野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动。我亲眼看到了五万斤的番薯田。去四川访问前，在北京听说有人要搞这么高的丰产试验，不怎么相信。根据个人的经验，单位面积产量一下子要提高这样多，实在不容易一下子想得通。到现场一看，信服了。

最近，听说广东有亩产一百万斤番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是一次插秧而不是并田的）的高产试验田，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动。所以有番禺之行。9月4日上午，我们走出了广州市郊，到达番禺县大石乡。我首先去参观那块番薯试验田。这块试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住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插下了，要长薯块。薯块又往那里长？到了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这块一亩五厘地的试验田，是用土垒成了七垅高远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薯苗六千株，一共有四万二千株。乡党委书记解释说：每株年产二十五斤（采取分期抽挖薯块和间补薯苗的办法），合计一亩全年便可产105万斤。这块试验田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无比创造力，他们的高度的科学水平。它的特点是三维种植，“高空”发展，这就大大扩大了种植面积，使大量的薯块有“容身”之地。在梯形的高畦上搭上四层的金字塔形的竹架，把密密麻麻的薯蔓挂起来。这就不但可以避免薯蔓与薯块分争养分，而且扩大日照面积，增强光合作用。追肥，用的叫做“按位施肥”办法，群众也叫“打针”，它的作用是把肥料施到人们预定的位置，引薯块朝那里生长。我认为。这在科学上是个重大的革新。我看，亩产一百万斤是有把握达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亩产六十万斤，这在农业科学上也是空前的伟举。[\[84\]](#)

3、人民公社诞生

人民公社这一产物，事实是由“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变高级社”而来。

毛主席对大社的情怀，最早有据可查的言论出自1953年10月15日的农业部负责人谈话里：

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85\]](#)

1955年下半年，中央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人力编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这本书中，收入了各地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报告和材料。毛主席以极大的热情，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并给其中100多篇文章写了按语。[\[86\]](#)

在《大社的优越性》这篇文章的按语里，毛主席肯定了文章的结论“社愈大，优越性愈大”表示：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这篇文章的按语里，毛主席继续夸赞大社：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1956到1957年全国就兴起了一股“大社”风，由于一哄而起的并社运动造成了一些不好的问题和现象，1957年9月中共中央联系发布指示，叫停了这一轮的“合并大社”潮。

文件中明确指出：“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也证明中央1956年9月指示中规定合作社规模的一般标准，是适宜的。”，文件明确要求“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87\]](#)

推动并社的直接起因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兴起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许多地方开始突破现有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试图通过并社解决统一规划和集中劳力、物资、资金等方面的问题。

比如，四川省泸县“兴修水利、积造肥料和改良土壤的任务很大，而全县平均每个农业社只有六十多户，人力物力都感不足；在土地方面，也由于小社分布零散，不便统一规划；

特别是不少农业社领导骨干薄弱，财务制度混乱，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并小社为大社”。

于是，中共泸县县委决定进行并社工作，在春耕前夕把全县3000多个中小型农业社合并成700多个大社，规模平均在250户左右。这时的并社，增强了集体协作的力量，办了不少以前办不到的事情，尤其对于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这些薄弱环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88\]](#)

毛主席得知地方的这些经验后，兴趣很大。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谈到并社的问题时说：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89]

4月8日，政治局通过了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决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90]

这样，1956年9月的指示“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的合作社政策，宣布作废。

一场轰轰烈烈的“小社并大社”的运动，在全国农村展开。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报道说：“把城门、下洋、龙江等乡合为一个新乡，把二十三个农业社合并为一个联社，下分十一个分社。”[91]

关于人民公社这一名词的诞生，多方分析材料表明。是人民群众创造、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商议后确定的。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大社，则是全国第一个挂出“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来到七里营视察。看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这块牌子时，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念起来。中共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对毛泽东说：“这是全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旁边的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问道：“他们起这个名字怎么样，行不行呀！”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92]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将毛主席访问和听取当地干部汇报的新闻发布后[93]，全国一哄而起，开始大办人民公社。

如果人民公社只是简单的为了解决小社在修建水利设施时劳力不足和沟通协商的问题，那么可能不会演变成后面那种形式。但是人民公社却有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挂上了钩。

1958年的春夏，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被热火朝天的景象感染，开始畅想“共产主义”社会。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非常具体的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只是使用了很多抽象、概括性的语言来总结共产主义的形态。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另外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的根基，还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在当时要具体地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毕竟不现实。

但是当1958年各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热火朝天的景象下，作为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目标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确实有“底气”去畅想共产主义的图画。

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言，结尾部分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

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94\]](#)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陆定一在6月份编辑了一本书，名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本书的编者的话里，有这样的文字：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这本书在后来的8月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参见会议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作了推举。

8月上旬，毛主席到冀豫鲁津地区视察。其中河北徐水县的视察，被《人民日报》以长篇通讯的形式报道出来。我们重温一下部分片段：

（毛主席）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

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

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更早期地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些口号，发自和毛主席心连着心的人们的心坎上、心尖上。这里平原一望无际，墨绿的庄稼给阵阵的东风吹得一浪一浪地滚滚向西。大寺各庄农业社员们的口号声和欢呼声，也带着整个村子里永不平静的激动的心，一浪一浪地紧跟着毛主席告别的手臂，回旋不已。[\[95\]](#)

这些报道如实地反应了人民群众和毛主席心连心的情况，反应了群众“大跃进”的干劲。这种情况就更加加深了上下层互动推波助澜的效果。

1958年8月中下旬，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议钢铁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创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

.....

创建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6\]](#)

决议的出台，为人民公社扫清了一切障碍，早已经在农村刮起来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进一步盛行起来。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了嵊岙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的做法。[\[97\]](#)

这里所谓的“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指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多次在“大跃进”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中，强调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在毛主席看来，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98\]](#)中提出来的。马克思在书中批判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只能是等量的劳动，获取等量的报酬。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把这种平等的权利称之为：“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这样认为的理由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而毛主席在多次的讲话以及后来某篇著名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99\]](#)中，把马克思的意思理解错误了，马克思的一切逻辑都是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0\]](#)这条出发。但是毛主席却要在“资产阶级”文化不发达的新中国，凭空建立共产主义、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且还将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挂钩了。

随后大力提倡的一些“共产主义”措施：废除等级、废除薪金、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曾经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101\]](#)思想和理论。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02\]](#)：

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在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表扬了当地农民办人民公社的创举，指出这是我国五亿多农民继续前进的方向以后，农民群众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迅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举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成千上万张决心书、大字报，要求批准办公社，敲锣打鼓，热烈庆祝公社成立。

9月11日,《人民日报》将北戴河决议文件公开发布:[103]

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

于是,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规模开始了。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8年9月30日编印的《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的报道: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全国大陆除西藏外的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人民公社。

到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达到26000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以上。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国上下齐刷刷地建成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的特点,当时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所谓“大”,就是社的规模大。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七十四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170户,二千多亩土地和350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变成了2.65万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五千户,六万多亩土地和10000个左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变成了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十倍以至几十倍之多。如:河南省遂平县杨店、土山等五个乡、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创建了9369户、43263人的卫星人民公社。商城县何店、丰集等十个乡,六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创建有20457户、98273人的超英人民公社。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

在十一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中,五千户以下的5287个;五千户至一万户的1718个;一万户至二万户的533个;二万户以上的五十一个。河南、吉林等十三个省,已有九十四个县以县为单位,创建了县人民公社或联社。[104]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

组建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

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经营和转为公社所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人民公社的“公”,还表现在领导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的不同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资料供给制三种形式。

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这是社员收入中的主要部分。

《决议》虽然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也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

工资制则是在供给部分外，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象征性地支付给社员少量的货币。

供给制被认为是按需分配原则的体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要求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实行的范围。

为此，有些公社宣布对社员的生活实行“七包”、“十包”甚至“十五包”、“十六包”，即包下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各种基本生活费用。

河北省徐水县干脆取消了按劳分配制度，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包下社员的一切生活需要的供给制，并认为是“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渡的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即将所有劳动力按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实行统一指挥，在各种“大办”中用参加战斗的办法进行部署和调动。

同时，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公共福利事业，以便解放妇女，节省劳动力，并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

到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至90%。^[105]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中，随着供给制的实行和浮夸风的盛行，刮起“共产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

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59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山东省寿张县（该县建制后被撤销）规划，两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

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有的省委也制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土地、资金和产品等可以由国家无偿地调拨使用。

徐水县等地为了消灭私有制，还将农民的家具等财产收归公有，以至于农民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还有些人提出，缩小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产品的直接调拨和分配，实行非现金结算。

报刊上广泛开展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把工资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主张继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残余。

一个时期内，这种想当然地以高速度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风泛滥起来。

从上述情况看，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

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

当然农民对于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是有反抗的。

因为对于小农经济的个体而言，解放初期已经实现“耕种有其田”，“共”别人的产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别人来“共”自己的产，就会本能地进行反抗。

当时的中央文件对农民中的这种思想有过这样的描述和分析：

据若干典型调查：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占 80%多，其中主要是贫农、下中农，他们的反映是：“决心办公社，意志坚如钢，把心交给党，把人交给社”。基本拥护，但有若干思想顾虑或误解的占 10%左右。抵触不满的占 5%左右，其中主要是部分富裕中农。这部分富裕中农，在思想教育愈深入，愈接近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更加鲜明。在处理残存的生产资料上，少数富裕中农对私有制度留恋不舍，千方百计的隐瞒、分散财产，想“留一手”、“捞一把”，甚至大肆挥霍浪费。[106]

对于反抗的农民，就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形式主要以“大辩论”为主。关于“大辩论”的形式和实质，这里引用一段资料来说明一下。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毛主席提出“对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107]……“社教”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两条：其一、“合作化的优越性问题”。即必须承认合作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合作化以后粮食增产了，日子过好了。其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即够吃也好，不够吃也好，必须按规定指标完成征购任务。而“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事实上，“社教”有露骨的现实目的，那就是把粮食收上来，把反合作化反统购统销的思想打下去，简而言之，社教就是交粮……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与交粮二者构成一个圈套：首先，你必须承认增产、有粮，接下来交粮顺理成章，如同挨了打，还必须说打得舒服一样，这样的日子还长。

毛主席要求在社教中“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批判之。”[108]

《人民日报》的社论进一步教导：“大鸣大放只不过是让大家把在高粱地里、在茶馆里议论的话，放到小组会、座谈会、辩论会上来讲；让干部们本来听不到的话和看不到事能够听到和看到，让过去在各种伪装掩盖下的反社会主义的人和他的活动显露出本来面目，……让阴暗的角落受到阳光的照射，就不会发霉了。”[109]

报纸上所有声称粮食不够吃的农民，不是“吃得红光满面”就是“长得白白胖胖”。不论家中有多少粮食，几千斤也罢，还是秋收后“有几十斤大米放

在床下”，都是不缺粮的铁证。家中没吃的被迫到城里挤馆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诗人笔下，他们更是一帮阴暗角落里的丑类。[110]

通过这样的“大辩论”，当然没有人再出来反对人民公社了。

四、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成绩与缺点

大跃进调动了人的一切主观能动性，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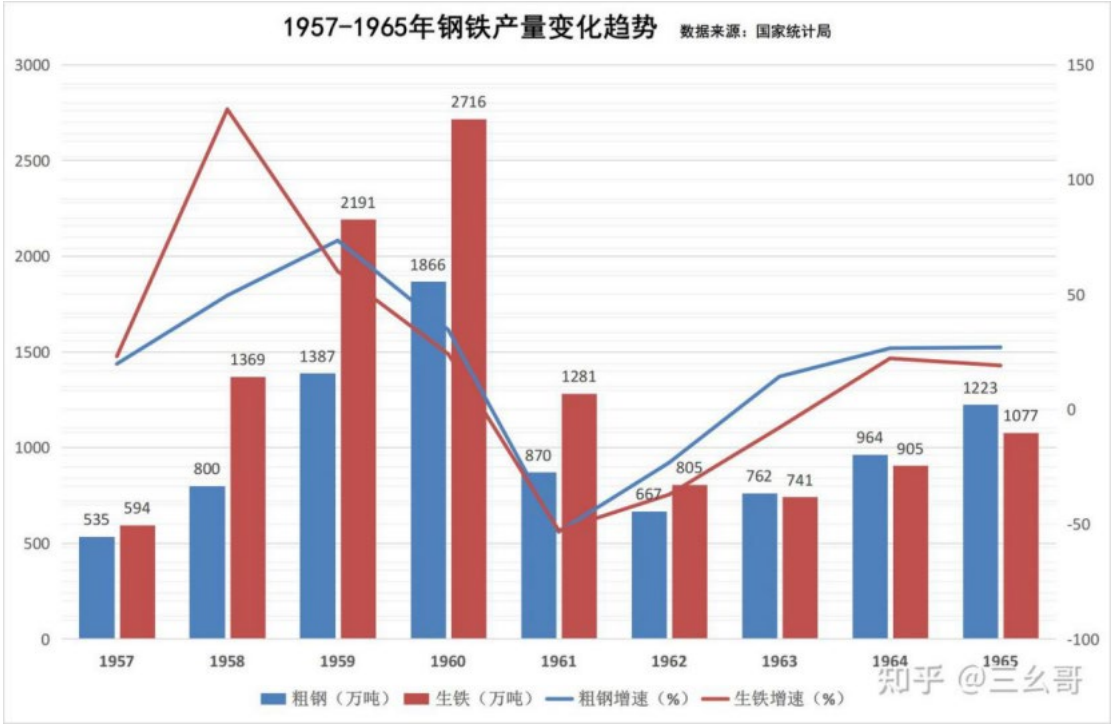
工业方面，多个工业产品在 1958-1960 年的三年间，取得了很大的增长。其中 1958 年粗钢和生铁增长速度分别为 49.5%和 131%。

1958 年钢产量(包括一部分土钢)达到 1108 万吨，比上年增长 1 倍以上，即增加 573 万吨。生铁产量(包括一部分土铁)达到 1369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1 倍，即增加 775 万吨。钢铁产量在这一年实现翻一番的伟大成就，是经过全国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而取得的。[111]

1958 年是大跃进的发起之年，而真正的大跃进高潮发生在 1959-1960 年。

虽然之间经历过“压缩空气”的“波折”，但是 1959-1960 年，全国上下还是沉浸在“一定能够跃进”和“再跃进”的狂潮中。所以 1959-1960 年各种工业产品的产量相比较 1958 年来说，依然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速度。

以粗钢和生铁为例，1959 年分别增长 73%和 60%，达到了 1387 万吨和 2191 万吨。



大跃进前后时期钢铁产量变化趋势

但是产量的大跃进和高速度的增长，并不能掩盖产品质量的下降、安全事故的增多和劳动时间的延长。

钢铁工业主要是铁多质量差，钢和钢材生产得少，引起了钢铁生产比例失调，也加大了钢铁工业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今年 1-4 月份全国的生铁产量为 606 万吨，但是，根据各省地方铁厂 4 月份调给上海钢厂的好铁只占 60%左右来推算（调给上海的好铁比例还比较高，其他一般还低于此数），大约有 150 万吨左右是不能使用的坏铁，占总产量的 1/4 左右。生铁产量多而质量不好，影响到钢和钢材产量的迅速增长。……由于追求生铁的产量，而质量还没有过关，矿石、焦炭、洗煤和耐火材料的供应显得很紧张。在上述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只得大量利用贫矿和土焦来炼铁，从而扩大了消耗定额。
[112]

从以下钢、铁、煤炭、建材、轻工等 14 种产品来看，1960 年质量比 1959 年提高的只有两种：重点企业的转炉钢和棉纱；基本稳定的 3 种：水泥、棉布、毛织品；下降的却有 9 种：生铁、电炉钢、平炉钢、非重点企业转炉钢、原煤、洗煤、纸和玻璃等。与 1957 年比较，在 11 种可比的产品中，质量提高的只有棉纱一种。平炉钢、电炉钢、生铁、煤炭等主要原材料的质量，逐年下降。
[113]

1960 年全国各工矿、交通企业职工因事故死亡 22511 人，比 1950 年增加 2.5%。其中，煤炭系统最多，死亡 7 081 人，比 1959 年增加 17%；冶金系统次之，死亡 4 556 人，比 1959 年增加 38%；铁道系统死亡 1595 人，比 1959 年增加 28%。此外，由于交通事故而死亡的非交通部门人员也增加，仅铁道部统计，即达 5300 人，比 1959 年增加 46%。设备事故也大量增加。如水电部电力生产事故，全年达 5000 次，比 1959 年增加 1 倍多。铁道部列车颠覆和冲突事故，达 110 次，也比 1959 年增加 1 倍多；全年由于行车及火灾事故损失 4762 万元，比 1959 年增加 2.5 倍。冶金部 17 个重点企业上半年共发生设备事故 6152 次，损失 7463 万元，比 1959 年同期次数增加 90%，损失金额增加 1.5 倍。
[114]

1960 年 5 月 9 日，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发生了一起特大爆炸事故，684 人死亡，这起事故成为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矿难。2005 年，山西省有关部门在老白洞煤矿旧址设置“五九事故纪念馆”，纪念 60 多年前命丧矿井下的 684 名亡灵。
[115]

“一五计划”期间，每炼 1 吨铁需要铁矿石 2.5 吨，焦炭 0.8 吨。到了 1959 年，每炼 1 吨铁需要铁矿石 3.5-4 吨，焦炭 1.3 吨（地方小高炉甚至在 2 吨以上）。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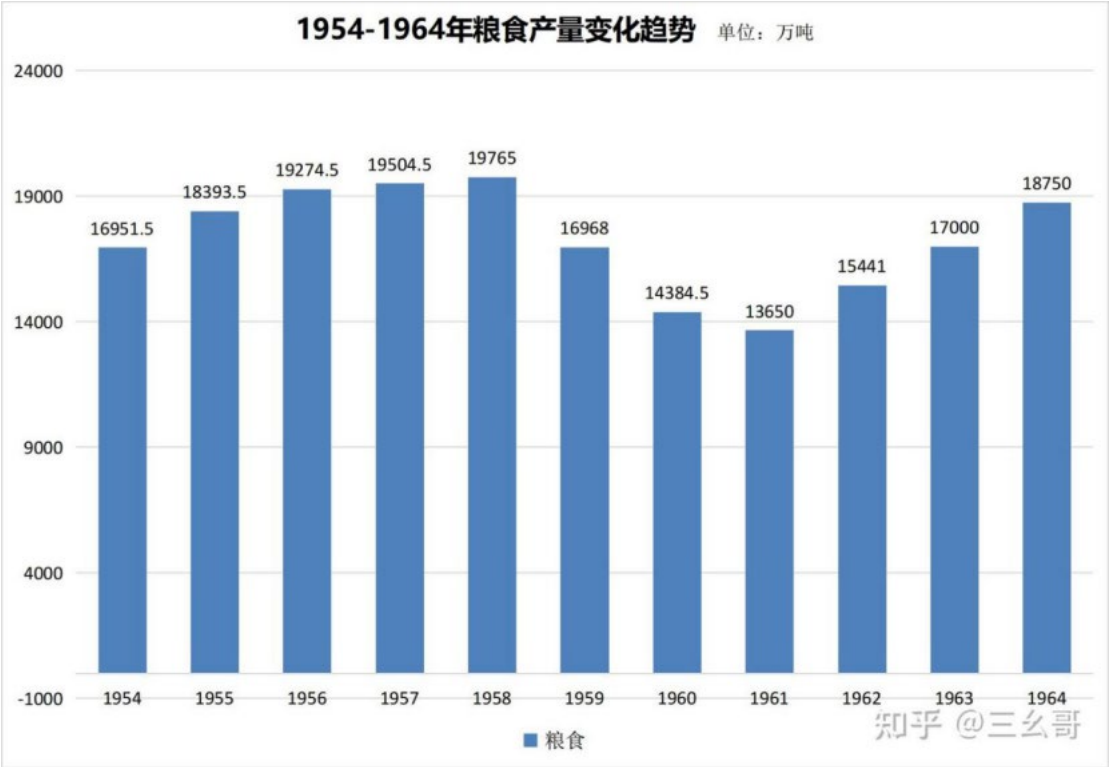
以炼铁需要的焦炭为例，1958 年产量为 2174 万吨，增长 162%。增长率远高于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1959-1960 年，焦炭产量分别为 4504 万吨和 5647 万吨，分别增长 107%和 25%。

大跃进时期，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非出现对应的“跃进”。1958-1960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6901 元、6384 元和 6956 元，市场工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9016 元、8720 元和 9712 元。其中 1959 年由于企业盲目扩展，增加工人和管理人员，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负。

在钢铁产业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上，中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苏联为中国的 13 倍，美国为中国的 27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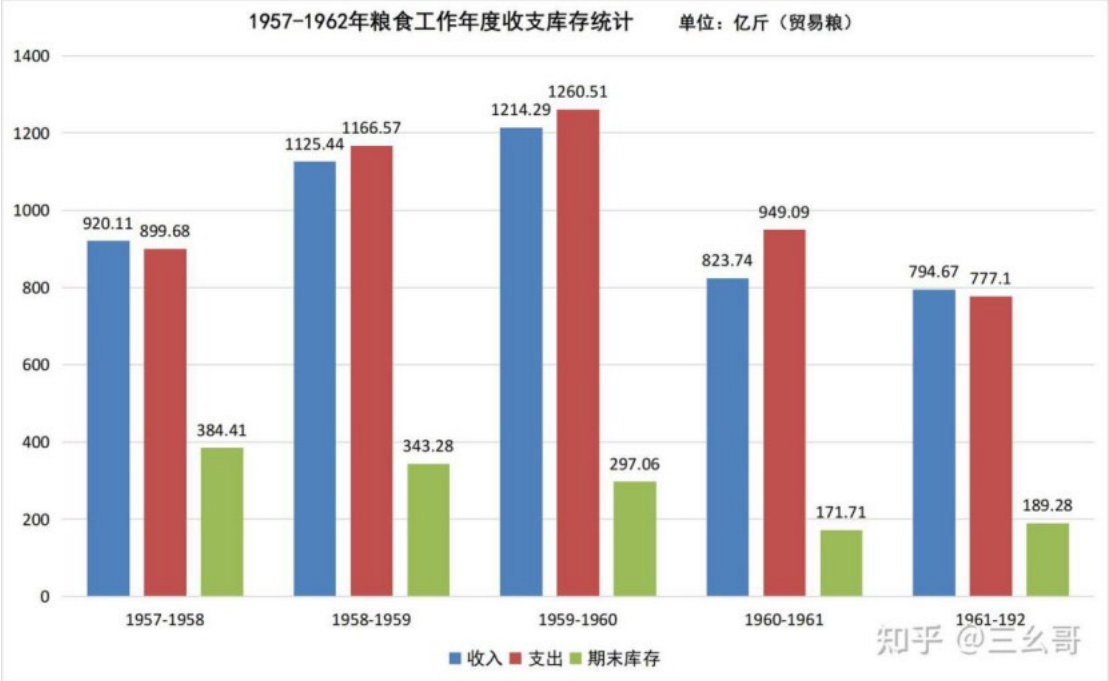
说完以钢铁为代表的工业，让我们回到农业上来。

1958 年各地浮夸风盛行，最终粮食产量为 19765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1.3%。这一记录要到 1966 年才被打破。[\[117\]](#)和以钢铁为主的工业相比，1959 年粮食产量并未出现增长，该年粮食产量为 16968 万吨，下降 14.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前文提到，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和市场混乱的情况，1953 年 10 月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查阅相关资料，可大致得到 1957-1962 年之间的“统购统销”和粮食收支与库存的数量。



数据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贸易粮 $\approx 0.8x$ 原粮



数据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贸易粮 $\approx 0.8x$ 原粮

数据比较直观，我这里就不分析了，这里插入一段文字：

上个世纪 50 年代，四川和全国一样，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对农民的粮食征购已经处于一种高额的状态。

但从 1959 年开始，为了保证粮食调出任务的完成，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粮食征购的力度，由 1958 年前的 30% 左右，提高到 1959 年的 48.9%，1960 年的 46.2%，1961 年的 38.8%。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征购数额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降低农村留粮来完成的，农村人均留粮锐减，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时间，分别为原粮 278 斤、260 斤和 258 斤。征购率比全国平均高 9.2、10.7 和 9.2 个百分点。留粮数分别比全国低 6.3、26.4 和 29.9%。据当时调查，全省约有 30% 的地区缺粮面达 40% 至 80%。而城镇人口的口粮标准减至每人每月 18 斤左右，1960 年 9 月 1 日，四川突然宣布废除旧的四川省地方粮票，这样全省少销售 600 万斤粮食。

.....

四川 1959~1961 年的粮食外调是在中央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进行的。四川省委所面临的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调出粮食支援京、津、沪、辽宁等市省；另一方面粮食大量调出又会对四川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1960 年 7 月 28 日，李井泉给中央主管粮食调运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

信，提出“：前几年外调任务较多，并不是因为当年征购多而增加了外调，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而增加外调任务的。现在库存不多，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后的差额，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为征购较多，曾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省缓和一下。”中央最后同意，四川 1960~1961 年度粮食外调任务为 31 亿斤。但总的情况是，四川认真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四川人民为了支援国家渡过困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58 年冬天以来，农村出现了营养不足，水肿病流行，局部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全省人口死亡率从正常年景的 10%左右，到 1960 年升至 54%左右的最高峰，1959~1961 年三年全省人口死亡 885.3 万人，大大超过了正常年景的死亡人数，1961 年非正常死亡 200 多万人，并且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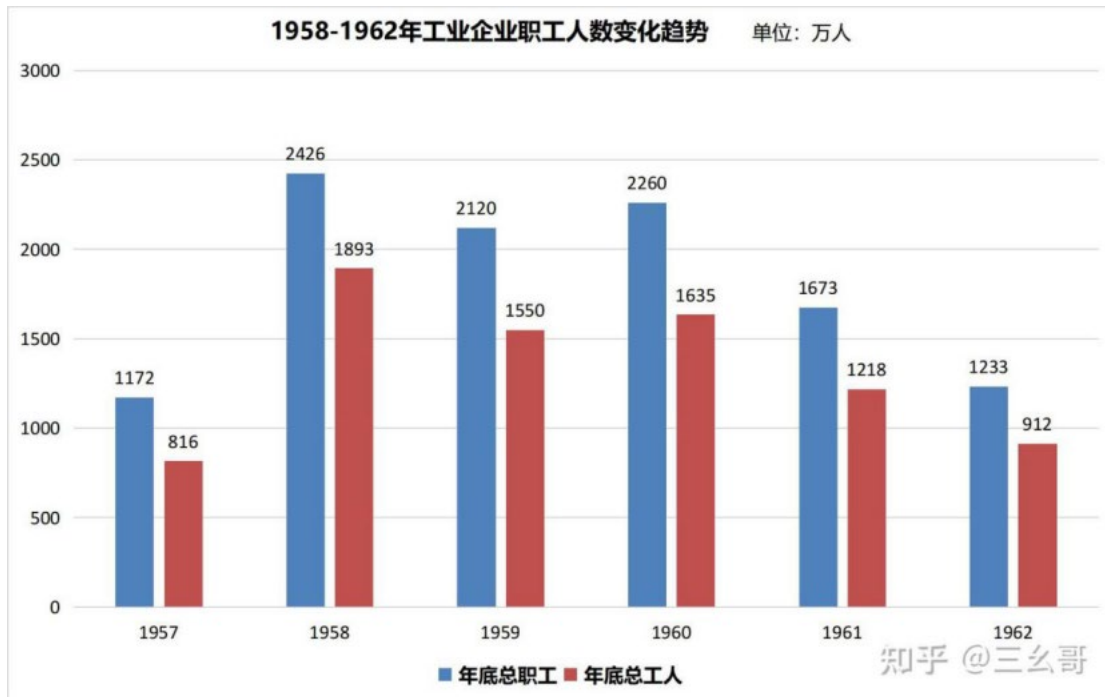
大跃进期间的粮食问题，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原因一直被很多网友忽视。那就是当年大幅度增加的工人。

按照国家的工业化路线和城市待遇标准，工人的粮食必须优先保证。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斤）		
居民类型	15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标准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
大中学生	32.75	35
一般居民及10岁以下儿童	26.15	27.5
6-10岁儿童	20.56	22
3-6岁儿童	8.85	9
3岁以下儿童	7.89	8

数据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上面这个 1956 年城市居民的定量标准，在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充足。但是在 50 年代，缺少高能量的油脂和副食品，这个标准也只能说刚刚吃饱而已。



数据来源：《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720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年底职工和生产工人数量，分别比 1957 年增加了 207%和 230%。如此之多的新增职工，必然要求国家掌握更多的粮食，表现在粮食政策上，就是高额的征购和相对较少的返销。

这里附上已经被百度删除的百科词条“信阳事件”的少量节录，一窥当时的粮食紧张情况。

1958 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 281 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 702 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 年 11 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 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如：商城县越美公社现庙、汪桥管理区 6 个生产队 78 个食堂中，春节前后就有 74 个停伙断炊，社员四处挖野菜、苕麻根、草籽，甚至树皮充饥，先后饿死 50 余人。

1959 年 1、2 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连续收到群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 2 月 25 日在署名为“夏邑县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2 月 27 日，周恩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3 月 3 日国务院秘书厅派李锦堂、刘文亭、曹国瑞、武郁庆等到河南会同省委、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豫东地区调查。据开封地区统计，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3 月，因缺粮患浮肿病、饿死人的情况是“浮肿病人 136114 人，因浮肿病死亡 7232 人，死亡总人数 16640 人。由于及时采极了相应措施，安排群众生活，基本上控制了发生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未就此接受教训。

1959 年 8 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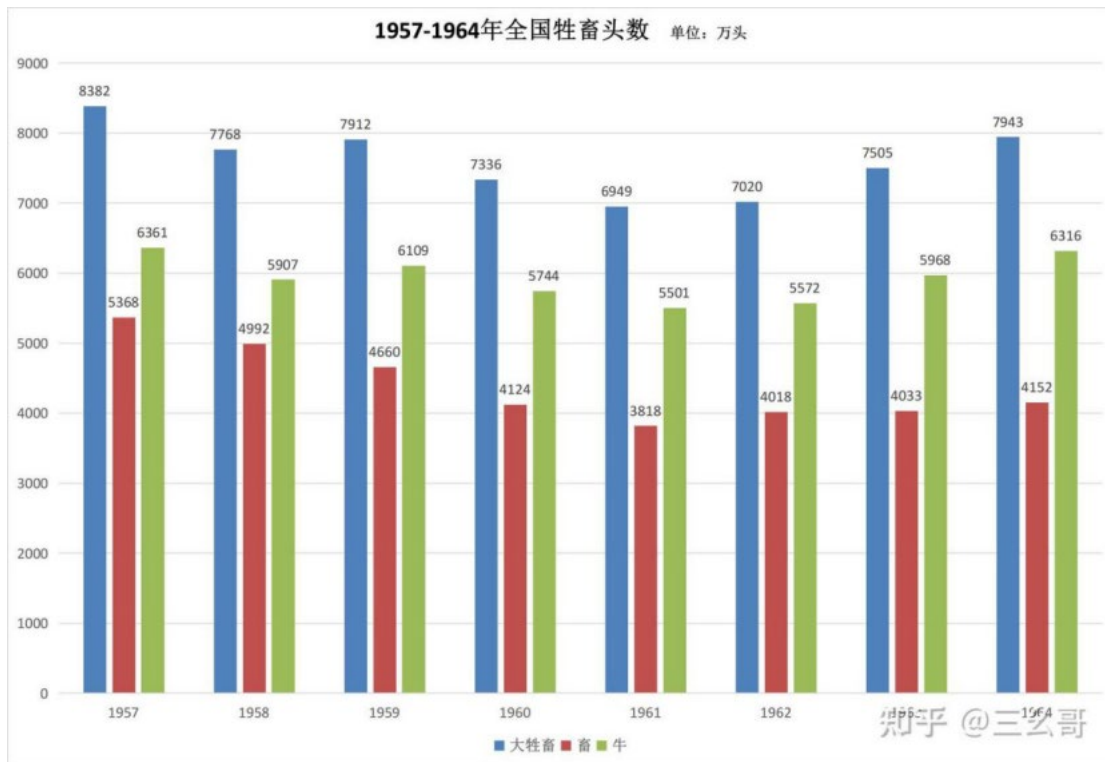
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高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滥。“共产风”再度刮起，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流，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5]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

上述一系列恶劣做法，导致了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惨剧。据资料反映，1959年10月下旬，商城县有692个食堂停伙，发病16686人，外流1766人，死亡4656人；固始县有7个公社289个大队发病33832人，死亡8177人。随后，潢川、信阳、光山、罗山、息县、新蔡、平舆、上蔡等县相继出现大批浮肿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据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最后一次呈报中央的数字是：全区总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1人，占总人口2.4%。死亡人数超过100%的有7个县：光山县235%，商城县209%，息县204%，正阳县196%，新蔡县183%，潢川县168%，固始县147%。[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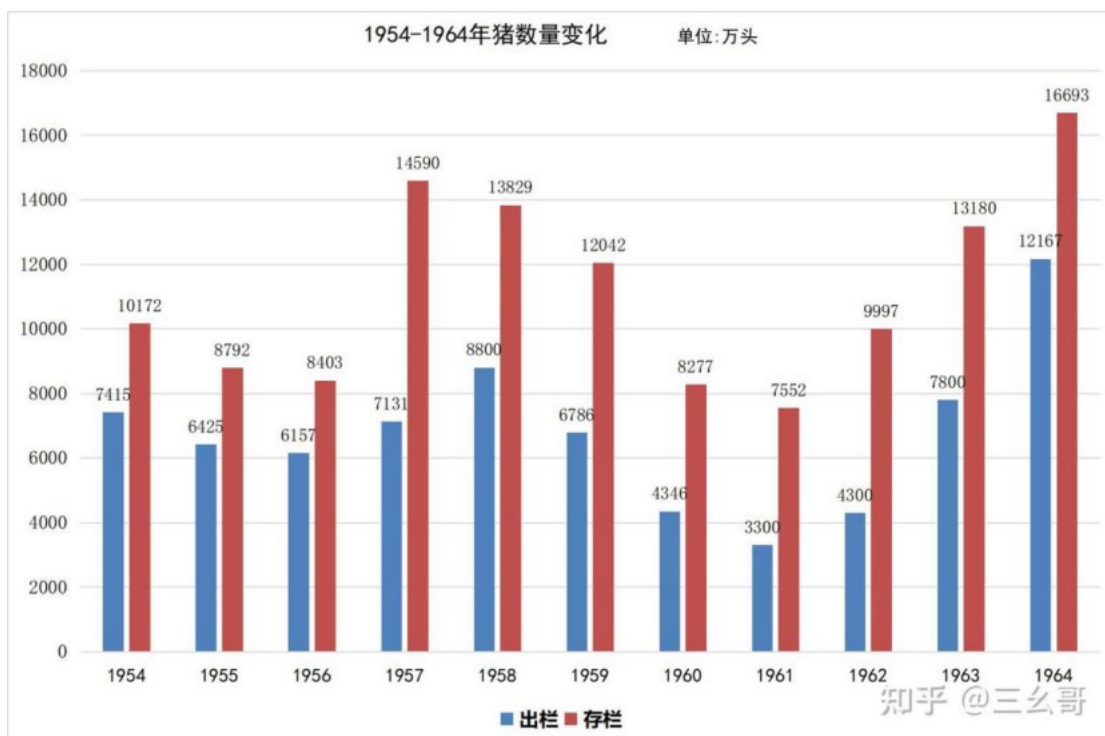
大办人民公社过程中，“五风盛行”。虽然报纸和领导人宣称人民群众拥护与欢迎，但在某些数据上，出现了下降。

1956年底，农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当年大牲畜头数为8773万头。1958-1960年，大牲畜年底头数分别为8382万头、7768万头和7912万头。1961-1962年，数据下降到7336万头和6949万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2》

1960 年，猪的年底存栏数为 8227 万头，比 1957 年 14590 万头减少 5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2》

社会主义改造并未促进农业生产，由于依然存在抵制，以及部分人民公社管理问题，大跃进期间，农村的牲畜处于减少趋势。大牲畜的减少，对于依赖牲畜耕作的农村来说，导致劳动生产率低。部分牲畜极度缺乏的地区，则只能

用人力来代替畜力。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

甘肃省的通渭县，在困难时期发生了大规模死人的情况，《通渭县志》记载如下：

1958年秋，全县共有284000人，比1949年增长22.5%，但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1958年冬，全县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荚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625人，死亡3687人，全县实有44592户，279687人。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1960年初共外流19081人，死亡42024人，至年底，共死亡60210人，外流1140人。1960年春节前后，有些通渭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向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书面反映了通渭的问题。于1960年2月开始，中央、省、地先后发放大量救灾款物，派大批干部赴通渭抢救人命，才使人口非正常外流和死亡现象逐步得到控制。至1961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78432人，绝户2168户，有孤儿1200余人，寡妇3000多人。3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72150人，比1958年秋的总人数减少25.4%。[\[120\]](#)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称：

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12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出了一段这样的评价：

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混乱和偏差，当时许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担心纠偏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取得切实的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122\]](#)

五、反思与其他

1、领导人的态度

当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对大跃进期间的各种虚高的指标，也是产生过怀疑的。这些怀疑最初应该是 1958 年的 10 月。

1958 年 10 月，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 月 24 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 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 11 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 300 斤麦子报成 400 斤。

在 1958 年 11 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粮食各地报的数字打个七折，还有 8000 亿斤，我只要 7500 亿斤就满意了。7500 亿斤—8000 亿斤就很了不得了。”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123\]](#)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24\]](#)

但是毛主席对虚高的指标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在保护跃进精神的同时，注意压缩指标，做好准备。保护跃进精神为先，压缩指标、做好准备为后。

在 3 月 20 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125\]](#)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都讲了不少助长浮夸风气的话。

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126\]](#)

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打针——打葡萄糖，打胡麻油和棉油，不禁诙谐而风趣地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在视察丰产地的时候，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的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

“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少奇同志还很欣赏沼气试验场的圆锥形种植法和其它的堆形种植法，他说：

“这是个好办法！这种立体办法，不搞沼气也有好处。这可以增多土地的面积，也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光。凡是同样面积的立体，以球形的吸收太阳光最多最大。” [127]

在 1958 年底到 1959 年上半年，党内的主要空气是“压缩指标”和“纠左”。但是 1959 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将基调从“压缩指标”和“纠左”变成了“继续跃进”和“反右”。错误没有得到认识，一部分对大跃进提出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分歧严重。毛主席反复强调：“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128]

不过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毛主席在 1960 年也承认：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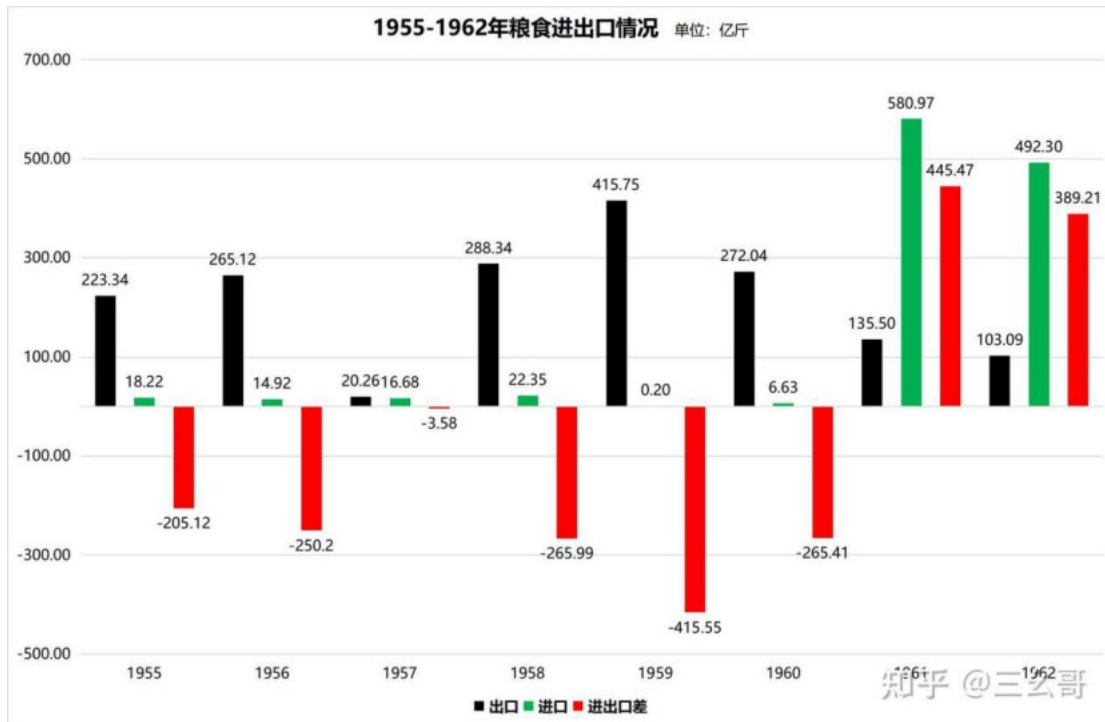
但是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130]

而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解决，最终酿成了更大的政治运动。

2、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工业化积累，1950-1957 年，我国基本上处于粮食进出口逆差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2》，p368

上图可以看出，在大跃进的三年期间，我国一直在大量出口粮食。进口粮食数量几乎减少到忽略不计。三年累计净出口粮食 947 亿斤。这个数字比 1959-1960 年粮食年度内，国家向农村提供的“返销粮”还要多 59 亿斤！

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 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3、苏联逼债的真相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131\]](#)

在课堂上、田地间和车间里，中国老百姓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苏边境铁路交接所在进行货物交接时，苏联人的刁难，例如当时鸡蛋都是用一个铁丝圈圈过的，大了小了都不行，稻谷一定要放在扬谷机吹到完全吹不出瘪谷，苹果要测量个头大小，猪肉必须达到四指膘，甚至有流传苏联人爱吃猪尾巴，中方只好在边境割了猪尾巴运过去。[\[132\]](#)

1961 年 2 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苏联可立即借给中国 1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古巴糖。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口头答复，感谢苏联《人民的善意，但是不必了，苏联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措施，实际上就是

婉拒了，以表现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最后中方只接受了 50 万吨古巴蔗糖。4 月，双方达成协议，中方借用苏联的 50 万吨蔗糖，可在 1967 年前以记账瑞士法郎易货形式归还，这期间均不计利息。

1961 年 3 月 31 日，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这段内容可以说明，1961 年苏联对中国提供了援助。

周恩来说：关于这个提议，苏联同志已经同意从库存中拿出 100 万吨谷物和 30 万吨小麦提供交付，中方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我们注意到，苏联向中国交付 30 万吨小麦而中国向苏联交付 30 万吨从加拿大进口的谷物。此外，周恩来问道，苏联是否能在近期交付小麦，加拿大会在 1961 年 7—8 月间交付（这意味着会很晚）。所有运费将由中方支付。

周恩来还问，能否将 30 万吨谷物增到 60 万吨。[\[133\]](#)

1964 年，中苏已经公开分裂，双方开始进行论战。1964 年 2 月 14 日，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提到了对中国的援助和贷款问题。

尽管中共领导人表现出这些公开的敌意，我们国家仍然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以前承诺的责任，仍然继续协助中国建设 80 多个工业企业，和从前一样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学者和大学生们还在苏联进行生产实践和业务学习活动。对于 1960—1961 年期间中国出现的经济困难，苏联的反应是兄弟般的。当中国极其缺乏粮食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中共领导建议，相互提供 100 万吨谷物和 50 万吨白糖。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在 5 年时间里按贸易结算方式分期清偿所欠 2.88 亿卢布债款的机会。[\[134\]](#)

根据沈志华等人的研究，中国在 1961 年欠下苏联约为 80 亿卢布的贷款。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 1965 年全部还清。到 1964 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 50 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 年 10 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前文已经引用过苏联解密档案，说明苏联领导人并非逼中国还债，而是提供了缓冲期慢慢还债。这里引用一段文字，来自中国领导同志的说法，同样也能证明苏联没有逼债。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 18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 80 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 79 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 5 亿，照此算需 16 年才能还清。如果按 8 亿计算，则要 10 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 5 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

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 14.06 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 13.89 亿新卢布，

剩下尾数 1700 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 1964 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 66.7 亿元，其中 1961—1964 支出的为 35.5 亿元，占 53%。

[135]

可见，中国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粮食紧张问题，和苏联逼债基本没有关系。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在 1961 年还对中国进行了援助。而 1961 年，四川的粮食紧张问题并没有缓解。[136]

4、为了面子不惜蒙骗自己和世界人民

1942 年，河南发生大饥荒。

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国民党政府救灾不力、通货膨胀、粮食减产、强征军粮等原因，在 1942 年到 1943 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 万人受灾，300 万人死于饥饿。[137]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根据多年从事 1942 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 1942 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 500 万石减为 250 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 250 万石变成了 250 万包。一石合小麦 140 至 150 市斤，一包含 200 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138]

1942 年的河南大饥荒，美国记者将灾情给暴露出去，蒋介石很不高兴。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灾情严重，但是媒体严厉封锁消息。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只能在内部资料和刊物上讨论。

包括《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在内的多个媒体，热衷于报道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对国内的粮食问题只字未提。

这里有一些《人民日报》在 1956-1962 年间，对国外人民生活在“饥饿”中的惨景：

“时刻受着失业和饥饿的威胁 美国工人生活朝不保夕”

“反对回到饥饿的三十年代！” 苏格兰万余工人示威

“英国社会制造饥饿 八十老翁被迫盗窃”[139]

““饥饿并没有缓和下来！” 美广大工人举行反失业示威 美报认为美国经济危机在继续发展”[140]

“美李集团榨干农民血汗 南朝鲜变成饥饿的土地”

“失业和饥饿的惨状遍地皆是 绝望和痛苦的呼声到处可闻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人民生活的悲惨处境”

“失业和贫困的幽灵在美国城乡徘徊 伴随着它的是饥饿、疾病和精神上的痛苦”[141]

“镇压反饥饿反涨价运动 印度西孟加拉邦大肆逮捕”

“不向资本家的饥饿政策屈服 美国钢铁工人坚持罢工”

“失业与饥饿的自由”[142]

“日本经济状况一年不如一年 新的一年面临更严重的失业、饥饿和物价上涨”[143]

“日本一千万人生活在半饥饿中”

“反对苛捐杂税 维护生存权利 南朝鲜农民展开反饥饿、抗粮、抗税斗争”

“凄惨度圣诞 贫民温饱难 美国几百万失业者在饥饿线上挣扎 西德贫民等待着一顿像样的饭 加拿大是三十年代以来最不景气的冬天”[144]

“南朝鲜各地人民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 愤怒谴责张勉傀儡集团制造法西斯恶法 西海岸八万多名渔民连续几个月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无着”[145]

所以，国外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太清楚中国的粮食问题。这一点在所谓的美国 CIA 的情报资料里面可以得到印证。

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用美国 CIA 的档案资料来证明中国没有发生饥荒，其中一个典型的版本是这样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方解密的 1961 年 4 月 4 日的绝密文件从根本上否认了饿死几千万的谎言，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这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方关于 1960 年中国灾荒报告的解密文件，刊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方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看：

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098172.pdf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网络域名“cia.gov”在全世界是唯一的，是不可能造假的。

已解密的美国中情局(CIA)1961 年 4 月 4 日的绝密文件：“结论 因为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尤其因为两年以来的恶劣天气，造成 60 年的粮食产量不比 57 年更多，但是却要喂养多出来的 5 千万人口。大规模的饥荒现在没有发

生，但是在某些省区很多人正遭受着营养不良.....‘大跃进’造成了人口的流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这份秘密文件是专门提供给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要员和美国军方的绝密情报，其真实性，可靠性不容置疑。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全世界最大，最具权威，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美国政府间谍机构。如果美国中情局(CIA)连饿死几千万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知道，那还不如关门算了。[\[146\]](#)

这篇文章的作者（该文最初来自著名爱国主义网站：四月网），认为美国CIA的档案“真实性，可靠性不容置疑”。这里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美国CIA收集资料形成自己的分析判断，是依赖情报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一般来说，美国CIA的档案真实性的确很高，但说他反映的是真实情况就是胡说八道了。

苏联解体，CIA在档案资料里面也没有预料到，是不是要根据CIA的资料来说，苏联一定不会发生解体？[\[147\]](#)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大部分的分析中国的资料，依靠的还是中国方面的公开资料。这里引用一段资料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情报报告和情报评估所依据的情报来源。我们通过2004年10月美国有关对华情报评估学术会议上对中情局官员的询问得知，他们的所谓“情报”，除了美国驻外各机构提供的信息或道听途说的消息外，主要来自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电台的广播(通过设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监听站)，利用职业间谍和高空侦察等技术手段得到的资料不多。美国情报部门当时基本不接受、也不重视台湾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情报官员借以分析的情报资料及其结论，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情局的分析官员认为：“尽管这些数据常常由于没有独立资料而无法核实，但根据对目前可获得的独立资料和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和比较分析，可以说评估中的这些数据就是中共所掌握的基础经济数据，而且我们认为中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夸大这些数据的必要。”但是，中国官方对数据没有进行故意修改，并不能证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准确的和真实的。[\[148\]](#)

所以，用美国CIA档案来说明中国的饥荒情况，是诉诸于更难获得真实情况的外部势力的行为。

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描写国内饥饿情况的新闻。更多的则是所谓的“外媒”、“友好人士”称赞、歌颂中国大跃进成绩，肯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报道。

比如，1960年的这篇报道：瑞士《合作报》载文赞扬我国人民战胜饥荒。同年的《参考消息》：人民公社为我国人民带来了幸福。[\[149\]](#)1961年还有：驳斥蒋帮说中国人民挨饿的谣言。

这里收录一篇外媒赞扬的内宣文章：

续昨日第四版[\[150\]](#)英记者斯图尔特·盖耳德访华文章如下：饥荒

我上次到中国，是在共产党革命前。那时，在河南和广东两省的大饥荒中，有八百万男女和孩子因为饥饿而死亡。在现代的西方，这样的恐怖是不可

想像的事。而在以前，中国人遭受这种苦难却是通常的事情。

今年，华北遭到了六十多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但是没有死一个人。因为没有囤积粮食和做黑市买卖的现象，每一颗粮食都是平均分配的。

在 1942 年到 1944 年河南和广东两省的大灾祸中，政府没有把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亲分开。许多人为了换取几碗饭，出卖自己的女儿。吃掉了这几碗饭以后，他们就吃泥土和树皮，一直到他们死去。

今天在公社中和全中国各地的中国人民愿意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年中只有星期天和九个全国性的假日，原因就在这里。尊严

因为肌肉酸痛要比肚子饿得饥肠辘辘要好一些。

过着享有自尊和人的尊严的生活要比在 25 岁像一头无人理睬的牲畜般地死去要好。在 1949 年前，中国人平均只能活 25 岁。

三十年来，没有一个英国人必须这样地生活和工作。

在一个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大部分的居住条件仍然是差得难以相信的。因为载重汽车不够多，千百万人不得不用大车搬运日常生活必需品。广大人民不能每天吃肉。现在绝大多数英国工人享受的奢侈品并不存在。

但是口粮是足够的。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粮食，而且价格很便宜。我和我的妻子同一位朋友在北京最大的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包括油炒饭、带有素菜的牛排和鸭肫肝、五香豆腐、啤酒和茶的五道菜每道不到三先令。中国首都的这家饭店相当于伦敦的萨伏伊饭店。同这比较，中国工人用餐只消几个便士。

当然罗，虽然粮食产量已大大增加，还远没有有足够的肉吃的情况，但那是因为还没有生产出足够的肉来，而并不是由于只有少数能够出得起供不应求的高价的人才能买到的缘故。所生产的肉供应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们——矿工、造船工、钢铁工和重体力劳动者。

中国这些物质方面的改进——其中包括出色的医药和社会服务——是重要的。

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革命，这个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对人的态度。我们在 5000 英里的旅行中没有看到一个乞丐或穷汉。

如果说这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政权已使它的人民丧失人性和道德败坏，那么为什么敬老院都尽可能地设在幼儿园附近，以使没有子女的老人能够与儿童一起游乐呢？为什么年老寂寞者受到这样关怀的照顾呢？

公社生活是沉闷单调的吗？成都附近的新民公社中有四分之一中年工人仍是文盲。他们的工具上贴上小图记，以便辨认。对他们来说，学习文化是一种新的快乐。每个公社都有电影看，摄影和制片的质量使我感到出乎意料。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业余歌舞乐器手队。

真理在违反一个人的偏见的时候，往往是使人感到不舒服和不安的。

我哪能使愁容满脸的中国儿童和成年人在照片中显得笑逐颜开。我的照相机摄下了它所见的。我报道的是我所发现的东西。[\[151\]](#)

在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记录。比如 1960 年 5 月 27 日，毛主席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就能看出来，蒙哥马利不仅被蒙蔽，称赞中国

的建设成绩。毛主席也很受用。

蒙哥马利（简称蒙）：我来到中国发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误，他们以为中国人是受压抑的，很不愉快，饿着肚皮。事实上，大家都很高兴，满面笑容，看起来都吃得很饱。今天我访问了一个人民公社。社长才三十岁，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的公社办得很好。

主席：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们的粮食还不够。按照平均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公斤粮食。

蒙：可是没有人饿着肚皮。

主席：这四百公斤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和储备粮。当然比过去有很大的好转。比十年前好，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就是比前几年也好。所以西方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蒙：可是大家还是有足够吃的。

主席：相对来说是够的。

蒙：孩子们看起来吃得很饱。

主席：这是对的。

蒙：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健康。

主席：他们是很高兴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了，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改善生活而努力。

蒙：我去天津近郊看了你们的士兵。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

主席：我们现在的日子还不能算是富庶。还要等十年或者两个十年，那个时候我们每人每年可能有七百五十公斤到一千公斤粮食。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了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粮食的增长可以满足你们人口增长的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人口的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的平均寿命已提到五十岁。[\[152\]](#)

六、尾声

此节我全文引用《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的文章[\[153\]](#)，请读者注意一下。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论及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时，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缺点和历史局限性，认为这次大会“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1\]](#)（P1206）。但书中对此一语带过，并不能够使读者充分了解这句话的分量和深刻内涵。笔者结合

近年来的披露的有关史实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此作一点补充，不当之处，请有关专家指正。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其间，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在开“出气会”的同时，还穿插了几次大会，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在会上讲了话。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于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也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过程中，党内高层的分歧已开始显露。自1月27日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始，这种分歧表现得更加明显。

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2]（P421）

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众所周知，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1]（P1110）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这势必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二则，毛泽东讲错误可能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他虽然不再像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错误“无非是一个时期蔬

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无非是想多一点，想快一点”，错误就是那么一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其思想状态与那时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的1961年12月，毛泽东就讲了这样的意见：“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1]（P1186）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的那句插话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实际上，会议上有些人的看法很能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58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不满，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3]（P1054-1055）

分歧还出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P419）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1]（P1111）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3]（P1079）

“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有哪些？党内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2]（P404）

然而，众所周知，在党内，最为“醉心于”群众运动的恰恰是毛泽东，他视群众运动为中国革命的独特传统和优势。大跃进运动的特质即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对此寄予厚望，企图以“群众运动+政治挂帅”的模式超越“干部+技术”决定一切的苏联模式，创造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人间奇迹。正如薄一波所言，“‘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3]

(P747)

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强调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4]他一再批评有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错误。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指责群众运动，认为那样做是“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否定群众运动。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5]（P183）他还专门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并写了两个语气激烈、尖锐的批语，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一批语甚至以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来要求人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可以说，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核心，否定群众运动实质上即否定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6]（P262），而刘少奇则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分离，不承认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品。刘少奇对群众运动的批评显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冲突的一个导火索。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搞四清运动只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搞神秘化，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分歧还在于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上。彭真在1月18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3]（P1059）虽然彭真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毛泽东的错误说得很轻，但在个人崇拜气氛日益浓厚的当时，说出这样的话已属不易，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才行。

很快，彭真的发言在会上遭到了攻击。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先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态度。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深刻认识。不错，毛泽东在会上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作了自我批评。但这种自我批评，是一般的、笼统的，甚至可说是有些勉强的，在很大程度上作了一种姿态而已。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7]（P296）这里，毛泽东讲他要对中央犯的错误负责，是出于一个

抽象的理由，即他是中央主席，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处在主席这个位置上才要对错误负责的，他是代表中央来负领导责任的，主要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具体的错误。“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1]（P1199）这里，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官僚主义，对于下面做的事情不知情，未能及时纠正下面的失误，以致造成今日的局面。毛泽东看似在作自我批评，其实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了下面。

实际上，对于他在1958年以来所犯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毛泽东始终是不愿意承认的。他始终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坚持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他认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是在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并非全局性的错误，从全局来看，成绩与错误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因此，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8]

毛泽东虽然号召发扬民主，提出要容许别人讲话，要让人批评，给人家出气的机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但这主要是从宽容的品德考虑。在内心里，他仍然认为自己坚持的是真理，导致“大跃进”夭折的是天灾。“此天欲挫我，非吾之不能也。”毛泽东的性格是坚忍不拔，“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9]他是绝不会因为一次尝试的失败就甘心认输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愿意太多地谈失误，谈教训。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是大会最重要的文件，而且也不算太长。但刘少奇让毛泽东看，毛泽东两次都说“没有看完”，这事情本身或许就能说明问题。恐怕毛泽东也像柯庆施一样，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劲”。对于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持的怀疑态度，他尤为不满。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2]（P426）毛泽东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尽管他说得很隐晦。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7]（P296—297）正如党史专家廖盖隆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在语义上同前面着重强调民主是不连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上述警告的真实意图是什么？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1]（P1469）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林彪1月29日的大会讲话大加赞赏。

林彪的讲话立意总是与众不同，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不例外。在大

家纷纷检讨工作失误的时候，他却在加强党的团结的名义下刻意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10]

显而易见，林彪这些话并非以深刻总结经验为出发点，而是话中有话，音在弦外。在各级领导人大都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讲话明显与会议气氛不和谐，具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并且有意使用了“我个人”的名义，以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真可谓用心良苦。这种做法很能表明林氏的风格。1959年，他在庐山的中央常委会上，几乎是破口大骂彭德怀，就是出于一种十分阴暗的心理。结果，为其后一连串的升迁奠定了基础。林彪惯于拍马的特长，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得到了“精彩”发挥。

林彪的讲话果然让毛泽东十分受用。毛泽东当时便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又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1]（P62）几年之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曾在关键时刻支持他的林彪。1965年11月28日，他曾让罗瑞卿捎话给林彪，要林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12]（P534）随后，他将林彪确定为接班人。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是极其深刻的，尽管这些分歧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冲突。实际上，正是在这次会后，毛泽东提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3]七千人大会成为毛刘产生分歧的起点，最终导致毛刘分手。难怪党内有老同志讲，没有七千人大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对于敢讲真话的刘少奇来说，七千人大会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之一。面对“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刘少奇受到很大震动。作为共和国的主席，“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深感内疚，因而变得比较务实，且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上，且敢于犯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至今仍然让人由衷感佩。

毛泽东虽然在七千人大会作了自我批评，但正如薄一波所说，毛主席有错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3]（P905）面对七千人大会上的一片

批评声，毛泽东内心里十分不满。他感到，他本人的权威和他首创的“三面红旗”正在遭受空前的质疑。正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他对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人产生了愈来愈深的疑虑。他对刘少奇的信任程度急剧下降。此前，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问他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还十分明确地讲：“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4]转折点就在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刘少奇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1966年，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并发问道：“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5]所谓“1962年的右倾”，首先就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1969年，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戴罪之身死于河南开封。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真同样遭到了厄运。以他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毛泽东指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首，呆在狱中达数年之久。江青在“文革”初期的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真实心态：“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16]

历史确实是“发人深醒”的。站在今天的高度看，七千人大会引发的悲剧凸显出了切实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党内出现分歧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形成公开公正地、和平地解决分歧的制度化机制。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其结果是一旦斗争爆发，局面便变得不可收拾。如果七千人大会上出现的分歧能够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及时得以解决，就不会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殷鉴不远，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基本构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果能脚踏实地地照此去做，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

参考文献：

- [1]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人民日报》，1958—10—4.
- [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增订第三版，183.
- [6]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6.
- [9]陈晋。毛泽东之魂[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5.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06—108.

-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62.
- [12]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534.
- [13]曹英等。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261.
- [14]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384.
- [15]《人民日报》，1967—8—5.
- [16]廖盖隆。党史探索：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40.

参考

1. ^这封信可以看这篇文章：
<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newlsq/sp/lnp048.html>
2. ^刘少奇的六次莫斯科之行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85148.html>
3. ^上述引用内容可参考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kpEAAAQBAJ&pg=PT36&lpg=PT36&dq=%E5%85%A8%E5%8E%BF%E5%85%A5%E7%A4%BE%E3%80%81%E5%85%A5%E7%BB%84%E7%9A%84%E5%86%9C%E6%88%B7%E5%B7%B2%E5%8D%A0%E6%80%BB%E5%86%9C%E6%88%B7%E7%9A%8487%25&source=bl&ots=L5N5ZP9Q5V&sig=ACfU3U3Q30Es1eXY0j9L1V0KqRye7ZFv7g&hl=zh-CN&sa=X&ved=2ahUKEwjblZ776aLyAhW6_XMBHX9yAHwQ6AF6BAgDEAM#v=onepage&q&f=false
4.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852117.html>
5.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3)<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90/65724/4444783.html>
6. ^毛泽东思想年编：1953年10月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236641/16618468.html>
7. ^出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571页
<https://socialism12345blog.files.wordpress.com/2017/03/e6af9be6b3bde4b89ce8afb7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e689b9e6b3a8e5928ce8b088e8af9defbc88e4b88be5868cefbc89.pdf>
8.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2】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07/c244520-19520523-2.html>
9. ^《中国共产党读本》连载 十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915/c85037-25664442-3.html>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决策的回顾》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决策的回顾》

12. ^刘少奇的这一表态和指示，见：《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原话为：“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929>

13.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http://www.reformdata.org/1955/0731/11874.shtml>

14.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http://www.dswxyjy.org.cn/n1/2017/0901/c244520-29509841.html>

15. ^党史百年天天读 • 3月21日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77/rss/channel/cn/columns/ruv4j9/stories/WS605832dea3101e7ce97451fe.html>

16. ^1968 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70.htm>

17. ^出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18. ^毛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言，即兴时不要稿子，走来走去，吓坏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https://news.qq.com/a/20110114/000611_1.htm

19.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704/c85037-22073260.html>

20. ^这是《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的内容。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1-01-1#184147>

21. ^文章发布在第一版的位置上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6-06-20-1#142592>

22.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84.htm>

2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442009.html>

24. ^关于 1956 年的冒进和反冒进，共产党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讲的比较详细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031/c85037-25948153-2.html>

25.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7-12-28-2#183858>

26. ^1957 年 12 月《人民日报》在线阅读

<https://www.laoziliao.net/rmr/1957-12>

27. [^]<https://zh.m.wikisource.org/zh->

hans/%E4%B9%98%E9%A3%8E%E7%A0%B4%E6%B5%AA%EF%BC%8C%E5%8A%A0%E9%80%9F%E5%BB%BA%E8%AE%BE%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7%9A%84%E6%96%B0%E4%B8%8A%E6%B5%B7%EF%BC%81

28. 这段内容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http://www.taihainet.com/lifeid/culture/lshc/200703/104987.html>

29.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11日），可参见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03.htm>

30.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12日），可参见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04.htm>

31.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我是反‘反冒进’的”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215/c85037-26210862.html>

32.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http://zhounlai.people.cn/n1/2020/0214/c409117-31587219.html>

33.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https://www.henandaily.cn/content/xxi/czzxian/2017/0525/47255.html>

34. ^揭秘：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去总理一职？

<http://zhounlai.people.cn/n1/2020/0811/c409117-31818578-2.html>

35. ^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云在“反冒进”中如何扮演主角

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4-05/27/c_126551496_4.htm

36. ^八大党章为何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417/c387115-26861318.html>

37.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演变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114/c85037-23539101-2.html>

38. ^薄一波忆战友告诫：若觉毛泽东讲话不对不要讲

https://cul.sohu.com/20110808/n315731150_2.shtml

39.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5.htm>

40. ^谁将毛泽东造成“神”：看建国后的个人崇拜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200909/0915_7179_1349616.shtml

41.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23.htm>

42.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24.htm>

43. ^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头条：《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2-12-1#187340>

44.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23/c244520-19678727.html>

45.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http://www.huaxia.com/zt/tbgz/05-080/2005/00372613.html>

46. ^1968 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29.htm>

47. ^1968 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33.htm>

48. ^1968 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30.htm>

49. ^可参看这篇文章，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bitstream/1885/8175/1/GLFunpubdoc05.pdf>

50. ^秘书范若愚：周恩来和毛泽东整风以前不是“风雨同舟”
<http://zhounlai.people.cn/n1/2021/0304/c409117-32042643-2.html>

51. ^1958 年与 1962 年中央财经小组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16/c85037-23850674-3.html>

52. ^周恩来辞职风波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1_335_305438.shtml

53. ^1968 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3.htm>

54. ^1968 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8.htm>

55. ^港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第三卷

56. ^关于这段历史，温铁军教授有这样的说法：“同时我们知道这也是五十年代，1957 年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做“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中央财政陡然下降，中央财政陡然上升，注意，这是 1958 年发生大跃进的原因。1957 年因为苏联停止援助，苏联援助的时候，战略性援助他是不要你马上还的，因为咱们是战略盟友，你不用着急还，你接受就完了。好了，苏联向中国投入，投入给谁？中央政府。因为主要是军重工业，当然是中央政府接住了，于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占比非常高。苏联一停止投资，1957 年说我们改成贸易了，中央政府手里就啥也没有了。于是中央财政的占比陡然下降到 20% 几，他叫做“坐滑梯”，刷就下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占比陡然上升到 80% 以上，70%、80%，于是就显得是中央没钱、地方有钱。所以 1958 年 1 月份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开了三次——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时候，当时的主要思路就是，毛泽东提出“一个积极性不如两个积极性”，既然中央没有投资能力了，不如调动地方，于是中央提出要调动地方参与国家工业化的积极性。”

57. ^该指示在 1958 年 3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3/4/1/#188772>

58.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http://www.71.cn/2011/0930/632466.shtml>

59. ^1958 年 3 月 7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双反运动促成中央各部跃进总形势 巨大潜力奔腾而出 今年炼钢七百万吨，铁路增产节约四亿多元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3/7/1/#189086>

60. ^195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火烧技术设计上的浪费和保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3/29/1/#191054>

61. ^这时时任化工部部长的陈涛写给毛主席的报告，《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收录了这篇报告。

62. ^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683>

63. ^同八大一次会议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也就是说，五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731/c85037-25377579.html>

64. ^参加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

65.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blog/2014-04-15/102088176/3283710452/c3b971f40101jvsl.shtml>

66.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

67. ^以上两段对话出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68. ^参加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

69. ^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http://hprc.cssn.cn/wxz1/wxxgwd/200909/t20090907_3957819.html

70.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4.htm>

71. ^“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运动透析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450479.pdf>

72. ^195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湖南省推广大量新农具节省了劳动力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7/16/1/>

73. ^1958年5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农业技术革命全面进军 全国农具展览会上群众智慧大放异彩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5/6/1/>

74. ^1958年公社化闹剧：老婆是不是自己的得请示上级
<https://history.sohu.com/20130709/n381010855.shtml>

75. ^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大跃进时期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019.html>

76. ^参加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MZDBio76/20.HTM>

77. ^195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第1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6/15/1/#197713>

78. ^ 1958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 第 6 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7/23/6/#200907>

79. ^ 1958 年 8 月 3 日《人民日报》 第 4 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8/3/4/#201878>

80. ^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030936/>

81. ^ 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7258>

82. ^ 1958 年第 26 号 -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58/gwybl195826.pdf>

83. ^ 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目击记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8/11/2/#202545>

84. ^ 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9/26/3/#205920>

85. ^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31015.htm>

86.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509a.htm>

87. ^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

<http://www.71.cn/2011/0930/632436.shtml>

88. ^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29/c244520-19738137.html>

89. ^ 1968 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这段话是党史中的记录，在武汉版资料的记录是：“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8.htm>

90. ^ 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http://www.71.cn/2011/0930/632468.shtml>

91. ^ 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 闽侯解决技术改革与生产组织之间的矛盾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4-12-1#192330>

92. ^ 1958 年的并社运动：人民公社化的前奏

<http://history.sina.com.cn/bk/ds/2014-12-04/1327110648.shtml>

93. ^ 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中对人民公社这一产物，毛主席是这样评价的：“毛主席还指出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8-13-1#202712>

94. ^参见中央党史出版社：《陆定一传》》
95. ^毛主席到了徐水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8-11-2#202540>
96.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http://www.reformdata.org/1958/0829/8798.shtml>
97. ^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9-04-1#204366>
98. ^哥达纲领批判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5-4.htm>
99.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04.htm>
100.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这一节
101.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0a.htm>
102.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二版：《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9-10-2#204798>
103.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1日第一版头条：《中共中央发布五项重要文件》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9-11-1#204875>
104.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和全国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29/c244520-19738153.html>
105.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和全国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29/c244520-19738153.html>
106. ^1958年9月30日简报：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
107. ^党史上的今天（8月8日）
http://www.gov.cn/ztl/17da/content_739165.htm
108. ^《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10日，也就是中央发布该文件的两天后，在第一版发表文章：《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7/8/10/1/#173744>
109. ^1957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经过大辩论整顿落后社》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7/10/8/1/#178015>
110. ^引用自网友书籍
111.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107
112.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115-p116
113.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129

114. ^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132
115. ^ 大同老白洞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8%80%81%E7%99%BD%E6%B4%9E%E7%85%A4%E7%9F%BF%E7%93%A6%E6%96%AF%E7%88%86%E7%82%B8%E4%BA%8B%E6%95%85>
116. ^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p116
117. ^ 统计局：《新中国 65 周年》，
p223<http://www.stats.gov.cn/tjzs/tjbk/201502/P020150213481078341062.pdf>
118. ^ 四川档案，2005 年 06 期：《1959~1961 年四川的粮食外调》，作者：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宁志一
119. ^ 已被百度删除的百度百科词条：信阳事件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36_KYv3BsYJy1NhCUlupwvbVpdZBaXdo0Zn0PyeJxVZL1alM9p16u8J4TXTNbIjBqfhewKpSaU9VJa0grl8Z2eS3Zkzleng1xr7rK2kAo9ldhsUOLJMBXH9MwVDgFSxjGHDoXuSVxKcM54-wLE9NOe7343Q42pazRBJA_VIe0Py1Ae0aNwUpfEEAQAIvS3rjZrTGBzckTR9NIu7nXANdN9YYhW00jwxHnBxmCbljAz6b7DawFGkQX82sSskacFu-Sh1536Dji1wp8XP9OcSL7a&p=84769a47839952ea2abd9b7d0d1296&newp=882a9645d29207f30dbfc7710f07cd231610db2151d4d6116b82c825d7331b001c3bbfb422201206d7c0786100ae4f5ee0f03d743d0923a3dda5c91d9fb4c57479d96168254e&s=e4da3b7fbbce234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user=baidu&fm=sc&query=%D0%C5%D1%F4%CA%C2%BC%FE&qid=e50db7a20001d982&p1=7
120. ^ 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p10
121. ^ “通渭问题”揭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08-11-04/15367.html>
122. ^ 《这个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23. ^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77.htm>
124. ^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7/065.htm>
125. ^ “大跃进”的发动【3】
<http://www.dswxyjy.org.cn/n/2012/1123/c244520-19678684-3.html>
126. ^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727231.html>
127. ^ 1958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https://www.laoziliao.net/rmrb/1958-09-18-2#205376>
128. ^ 毛泽东“指头论”源流考
<http://www.1xuezhexuezhexue.com/qk/art?id=437330&code=A2&pdyear=2011&pdno=01&flag=1>

129.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8/044.htm>
130.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5542>
131. ^徐焰：“苏修逼债”真相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1493.html>
132. ^“苏修逼债”弥天大谎骗了几代人：背后真相正相反
http://www.xilu.com/sstj/20190527/1000010000939958_1.html
133.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34.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135. ^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摘要），这里第二段是被删除的，第二段来源为一本书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1964%E5%B9%B4%E4%B8%AD%E5%8D%8E%E4%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5%B7%A5%E4%BD%9C%E6%8A%A5%E5%91%8A%EF%BC%88%E6%91%98%E8%A6%81%EF%BC%89>
136.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 147 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137. ^百度百科：河南大饥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A4%A7%E9%A5%A5%E8%8D%92/9838655>
138. ^发现大饥荒——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04/c40531-19784046.html>
139.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4/28/6/#193834>
140.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8/5/5/6/#194414>
141.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9/3/28/5/#217822>
142.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9/11/10/6/#233248>
143.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9/12/31/6/#236576>
144.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60/12/26/6/#260223>
145.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61/4/4/5/>
146. ^红歌会网站登载有这篇报道，可能自己后来觉得也很扯蛋，就删除了，这里快照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z2XU5dHERDjH2b5LPs1cJWgTr2hdsVrtTgbwtfhsz01ECztPBocuKW-N12_V-Nxn0T1kNzmTBAGka89szlFJsN18wOsdeS611BF6uqCoLZNzdJd7PdkJnJdg9Ce9oyGb20U-8n-12xXQ-RGPnfBvpueHp0cgdu2HV9wV_pEePCnIybfCt7TsFPoAJAj5kL4-D-INHtzzcG2yqGmW4A_NGReCuuSPdb-

cJmJqTm7kveTo_IFgS1c3ruZcZf7ap2dF1TvBQ1PQPPEoMLEEZL4kE0mThJ9oUhOmyHURH
OMBADhAApvpnp3u5z jD6DFd6HKodbSBpgbQhe3nPAI0aeNoQ6VIEbsr3hsSQ_M1DkqhmcU
2ihLR-PbR9dI4HxQyqGU86ktzrxKd088P-
DitZNlffrwjbtS78kjl4QEcdss_Z115W&p=8b2a9715d9c042a41baccc23474c89&new
p=9834c54ad5c04ae40afbc7710f00cb231615d70e3fd1d01f6b82c825d7331b001c3
bbfb423291b01d9c47b6300a94d5beef33079300127a3dda5c91d9fb4c57479c37522
&s=cfc208495d565ef&user=baidu&fm=sc&query=%B9%D9%B7%BD%BD%E2%C3%DC%B
5%C41961%C4%EA4%D4%C24%C8%D5%B5%C4%BEF8%C3%DC%CE%C4%BC%FE%B4%D3%B8%F
9%B1%BE%C9%CF%B7%F1%C8%CF%C1%CB%B6%F6%CB%C0%BC%B8%C7%A7%CD%F2%B5%C4%B
B%D1%D1%D4%2C%B0%D7%D6%BD%BA%DA%D7%D6%2C%CC%FA%D6%A4%C8%E7%C9%BD&qid=
9729be0100005b23&p1=2

147. ^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没能预测苏联解体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257
148.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 1948-1976》第一卷，p12
149. ^人民公社为我国人民带来了幸福 1960 年 5 月 20 日《参考消息》
https://www.sohu.com/a/398686600_482071
150. ^<https://www.laoziliao.net/ckxx/1960-12-17-4#36110>
151. ^1960 年 12 月 18 日《参考消息》：盖耳德赞扬新中国人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 <https://www.laoziliao.net/ckxx/1960-12-18-4#36168>
152. ^1968 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169.htm>
153. ^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 何云峰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5542>